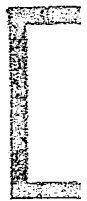


XXX



蘇維埃政權的
勞動者們的
貢獻



宣
556842
9842
2

蘇維埃政權對勞動者的貢獻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南京



3 1799 3068 4

目 錄

蘇維埃政權對勞動者的貢獻.....	一
蘇聯國家政權的高級機關.....	四一
蘇維埃代表——自己人民的公僕.....	七〇
蘇聯的國家結構.....	八五
個性與社會主義社會.....	九一

蘇維埃政權對勞動者的貢獻

H·阿莫沙夫

蘇維埃國家是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所創造出來的，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工人與農民的國家。一九一七年歷史性的十月，我國的工人與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和黨的偉大領袖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並建立了人民政權。

我國在蘇維埃政權時期會經過了光榮而偉大的道路。蘇維埃人民在戰場上和創造勞動方面所作的英勇事業與助蹟常使全世界吃驚。不過我們人民從來還沒有得到過，像在反抗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愛國戰爭中那樣燦爛耀目的光榮。

蘇維埃國家在戰爭中獲得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偉大的勝利。蘇聯人民以自己奮不顧身的鬥爭救出了人類脫離法西斯強盜的羈絆。

「殘酷的戰事對於我們自由，獨立和國家的存在孕育着致命的危險，使我們人民，甚至僻遠邊區的落後人們也知道，若蘇聯沒有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若沒有共產黨和斯大林的領導，這戰事的結束會是可怕的災害。我們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楚詳盡地認識，他們親手所創造的新民主的一切利益和優點。」（加里寧言論集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第四二頁）。



蘇維埃制度的利益與優點更可在我們戰後和平的社會主義發展情形中證明。雖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損毀，蘇維埃國家却與資本主義各國不同，它沒有經濟恐慌與動蕩而轉入到和平建設。蘇維埃人民憑藉社會主義制度的牢固的力量，自我獻身地克服了戰後的困難，有成效地復興國民經濟並同時進行宏大的新的建設。

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是怎樣構成的？什麼是它的優點和特點？蘇聯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維埃政權時代得到了些什麼？

(一) 蘇聯是最有力的社會主義強國

一九二一年列寧寫道：

「請看蘇俄的地圖。從伏羅格達向北，從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和沙拉托夫向東南方，從奧倫堡和鄂木斯克向南，從托木斯克向北，這樣廣大無垠的幅員，正可按置幾十個巨大的文明國家。可是在這些疆域上却為族長制，半野蠻和極野蠻所統治。俄羅斯其他的農民的僻遠邊區呢？：難道這些族長制，懶惰性，半野蠻性還不是到處得着優勢嗎？」（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八頁）。

蘇維埃政權就承繼了老舊的，資產階級地主政體的一個落後國家。正如革命前俄羅斯先進作家，人民思想的表現者所稱的，「葦草」或「木製的俄羅斯」。

我國在資本家——地主統治的時候，是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農業產品佔國民經濟總生產品的百分之五十八。俄國工業的發展大大地落後於其他國家。工業企業大部分落在外國資本家之手。例如，三分之二的各種冶金業和機器製造業，礦山和礦井爲外人所掌握。

一九一三年沙皇俄國的工業生產品要比美國少十四倍半，比德國少六倍，比英國少四倍半，比法國少二倍半。按照領土和人口俄國大大地超過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國。所以我國每個人民所能得到的工業品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更少許多倍：比美國少二一·四倍，比英國少十四倍，比德國少十三倍。

沙皇俄國對於重工業的發展，也即開採礦井、煤和煤油，生產各種金屬、機器、車床等的工業部門的發展特別無力。因此，全國工業、交通和其他經濟部門的大部份設備用具必須由外國輸入。俄國依靠外國技術之大可由下述事實判明，一九一三年俄國工業百分之六十三是由外國輸入的機器和車床來裝製設備的。

俄羅斯大部份人民所從事的農業經濟處於非常低下的水準。農民們用最原始的方法耕種田地，並不應用任何比較複雜的農業機器。好如一九一〇年進行的調查，農業用具計有一千萬把犁和木耜，四百萬把鐵耜，一千八百萬把木耜。農業技術落後。農民大眾根本不會使用任何人造肥料，土地分成小塊，耕種又十分惡劣，完全依靠自然力量，收成極低而且靠不住。

革命前俄國經濟的落後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格外被證明了。沙皇政府不能充分地供給海陸軍隊，不論武器和彈藥，不論軍裝和糧食。沙皇軍隊不僅大砲缺乏。就是步鎗也感不足。有時三個士兵合用一支步鎗。大戰時期，國家經濟一年比一年崩潰。開工的企業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已縮減到八百二十六所。一九一三年俄國開工的鼓風爐有一百五十一個，到一九一六年總共祇有一百十五只了。鐵路停止運輸。農業衰落：耕田面積一年比一年縮少，畜牧減少。國內開始饑荒。

在資本家和地主所組成的臨時政府之下，經濟崩潰繼續地加強着不可避免的災危、經濟崩潰、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威脅着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政權轉到勞動大眾之手，使我國從災危中得救而生，使俄羅斯人民從帝國主義戰爭的壓力中解脫出來。

蘇維埃政權最初幾年，我國的經濟情形仍十分困難。俄國內的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苦惱我國有好幾年之久，他們組織武裝軍隊反對蘇維埃政權。列寧和斯大林所創造的紅軍擊退了白衛隊，從祖國土地上逐出了外國的干涉者，在英勇的鬥爭中守衛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內戰結束和外國軍事干涉被肅清之後，布爾什維克黨所指導下的蘇維埃政府就開始領導勞動大眾加強復興被破壞時國民經濟，並且把它根本改造為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列寧和斯大林指示，我們必須在極短的期間肅清我國的落後性，用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速

度發展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列寧指出：『或者死亡，或者追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說道：『我們要比先進國家落後五十——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間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點，或者我們被人打翻。』（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三二八——三二九頁）。

飽受了布爾什維克黨鼓舞與指導的蘇維埃人民有成效地完成了我們偉大領袖們所指出的這個困難任務。

試看蘇聯的地圖。

在從前沒有人煙的地方，現在已建築了巨大的工廠和電站建築，城市和鄉村好似神話似的發展着，鐵路和運河滿佈。

在社會主義建設幾年中，創造了並狂風似地發展了黑色冶金和車床製造，汽車和拖拉機生產的工業部門、電力、農業機器、化學和石油的生產增加到巨大的高度。

軍事工業已有長足的發展。我國東方各區工業的發展更爲迅速。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創造了第二個煤和冶金業基地——著名的烏拉爾——庫士巴斯。在伏爾加和烏拉爾之間產生了新的石油基地——第二巴庫，在卡薩赫又有新的煤礦區——卡拉甘達。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速度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永遠的所不能想像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號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區選民會上歷史性的演說中指出，一九四〇年我國生產了一千

五百萬噸銑鐵，也即比一九一三年多四倍；生產了一千八百三十萬噸鋼，也即比一九一三年多四倍半；一億六千六百萬噸煤，也即比一九一三年多五倍半；三千一百萬噸煤油，也即比一九一三年多三倍半。一九四〇年我國大工業的總生產品要比戰前水準超過十二倍，其中重工業心臟和國防工業主要基礎的機器製造業的生產品要比革命前增加五十倍。俄羅斯的工業生產品量從前佔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而現在蘇聯則跳到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了。蘇維埃國家已變為最大工業的強國。

我國農業方面怎樣呢？

現在廣大無比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耕田野代替了狹小的貧農們的耕地，一九四〇年在這些田野上工作的有五十二萬三千架拖拉機和十八萬二千架聯合機。機器拖拉機站執行了當時集體農場春耕工作的百分之八十二，耕犁閑田的百分之七七，提高冬耕百分之七三。聯合機收割了集體農場所有播種穀物的百分之四二，落後小農的國家，採用犁和耙的國家已進入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農業大道，使國家俱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採用現代技術的農業。

應用機器和農業技術的集體生產提高了我們農田的收穫量，大大地增加了農業經濟的生產品。一九四〇年蘇聯生產了三千八百三十萬噸穀物，也即比一九一三年多一千七百萬噸；二百七十萬噸棉花，也即超過一九一三年的三倍半。

偉大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根本改變了我們祖國的容貌。從貧弱的落後的國家變為富有而先

進的，鋼和鐵，機器和車床的強國。第二五年計劃實施的結果完成了所有國民經濟中的技術改造。蘇聯工農業的生產技術不僅追上並且超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已成為經濟獨立的國家，保證自己經濟的技術配備，足能大量生產現代所有的國防武器。

這個歷史的轉變竟在難以相信的極短的期間——從一九二八年第一五年計劃起，總共不過十三年間就已完成。正如斯大林所說，「這真是一個跳躍，我們祖國在五年計劃幫助之下從落後的國家變為先進的國家，從農業國家一變而為工業國家。」（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的選民大會上演講第十二頁）。

偉大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實施使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獲得了勝利。在我國永遠肅清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和剝削階級，消滅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私有，剷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社會主義的生產體系，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為社會所有乃是蘇維埃社會的鞏固基礎。

所以，共產黨底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順利地實現的結果，使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蘇維埃政權在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和農業，在歷史上極短的時期中肅清了俄羅斯向來的落後性，而使我國成為堅固的堡壘，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蘇維埃政權時代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光榮地支持住了偉大愛國戰爭中的一切考驗。

正如斯大林所說，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基礎，「要比敵國經濟俱有更大無比的活力。」（斯大林「論蘇聯偉大的愛國戰爭」第一四〇頁）。蘇維埃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能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所創造的物資可能性，來發展國防生產，供給自己軍隊在進行戰爭中一切的必需品。

在第一次大戰時，俄羅斯軍隊總共不過有九千八百座大砲。我們現在跟這個數目有天地之別，在偉大衛國戰爭幾年中，單單斯大林大砲製造廠已製造了九萬五千大砲，坦車砲，反戰砲，自動砲。這能使蘇維埃軍隊在個別的作戰中同時應用大砲二萬尊以上。蘇維埃人民能夠戰勝敵人不僅是由于無比的勇敢和奇特的戰術，同時也因為有數量和質量優越的武器。在三年半的戰爭中蘇聯所出產的飛機要增加四倍，彈藥的生產也增加四倍，坦克增加七—八倍，大砲增加六—七倍。

雖然，我國烏克蘭、頓河區和庫班等的重要農業區域遭敵人暫時的佔領，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在戰爭期間仍不斷地供給軍隊和全國的糧食，保證那些為前線準備武器與彈藥的工廠與工場的原料。

在戰爭時期紅軍有最強大的最可靠的後方。斯大林說道：「正如紅軍在長久而堅苦的鬥爭中一次又一次地在軍事上戰勝了法西斯軍隊，同時蘇聯後方的勞動大眾跟希特勒德國和它的同盟國作戰，在經濟上戰勝了敵人。」（斯大林論蘇聯偉大的愛國戰爭第一四〇頁）。

我國在大戰時期不僅軍事上獲得了勝利，而且還致力建設，不斷地提高了生產力。在大戰幾年中，單單在東部地方建設了並且已開始工作的計有十座鼓風爐，四十五座馬丁爐和電力熔礦爐，十三座煉焦爐。這幾年來，在烏拉爾，西伯利亞，烏茲貝克和卡薩赫又增加了新的冶金企業，建設了幾十所電站，軍需及武器工廠，開採了幾百處礦井，猛烈地提高了烏拉爾和庫茲巴斯的煤產，在「第二巴庫」區增加了好幾倍的煤油產量。

在大戰時期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由于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宏大力量，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是由于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農和智識份子的英勇而獻身的勞動的結果。

勝利地結束戰爭之後，蘇維埃人民重新又回到和平創造的工作。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由戰爭轉入到和平時期正引起了縮減生產和增加失業的時候，而蘇聯人民却真正地向前猛進，並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恐怖。

蘇聯人民緊密地環繞在布爾什維克黨，偉大領袖斯大林的周圍供獻所有的力量肅清戰後的困難，更堅決地發展社會主義。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中社會主義競賽的氣焰一天比一天激烈。蘇維埃人民不論在復興被法西斯蠻強盜所破壞的國民經濟上，不論在新工廠、工場、礦井、電站和其他工業企業的建設上，都獲得了新的成功。

在戰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的十個月中已復興並開工了五座鼓風爐，十座馬丁爐，七

具壓延機，八處鐵礦，二十處頓巴斯的大礦井。

像斯大林格勒和哈爾科夫城的拖拉機廠，羅斯托夫農業機器廠，尼日尼——斯維爾斯克的水電站，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之類的巨大經營均已重新建設好。我們人民歡迎這些企業的復興，可引日丹諾夫的話為例，「這幾乎是死裏逃生，因為人所共知，法西斯暴徒會極度破壞了它們，爲要使這些企業的光榮名字重新閃耀在曾經有過勞動功績的蘇聯工廠和工場的榮耀的名單上，蘇聯人民不知化了多少勞動。」（A. A. 日丹諾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九週年」第一〇頁）。

蘇維埃人民十分高興歡迎復興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新五年計劃。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這個偉大的斯大林計劃，我們人民接受它作爲社會主義祖國經濟發展與繁榮的綱領。

新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復興我國受災害的區域，使工農業經濟復興到戰前水準，然後再大大地超越這個水準。

要解決這些任務首先必須復興和發展重工業和鐵路交通。在斯大林新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一九五〇年，蘇維埃的冶金工業所生產的鋼鐵和所生產的路軌必須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五。煤的產量必須超過百分之五一，石油產量必須超過百分之一四，一九五〇年電站的發電量達八百二十萬萬瓩，即比一九四〇年高出百分之七十。機械製造比戰前多二倍。鐵路運輸將達五千三百二十萬萬噸公里，也即超過戰前的百分之二八。

重工業和鐵路交通的首先復興使蘇維埃人民能迅速而順利地復興並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在這五年的過程中將復興、建設且使之開工的有五千九百個工業企業，在第二年計劃時祇有四千五百所新企業。一九五〇年我國工業生產品將比一九四〇年多百分之四八，而農業產品將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二七。這一切會使我們祖國的軍事——經濟的力量升到新的高度。

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技術的往前進步乃是大量提高生產的最重要和最必須的條件。

莫洛托夫寫道：「在高度技術和廣泛地應用科學生產的我們時代，當利用原子力和其他偉大技術發明的已成爲可能的時候，在經濟計劃中應當首先注意技術問題，注意提高我們工業的技術水準和創造高度熟練的技術幹部等問題。敵人妨礙了我們和平的創造工作。不過我們正在補充與達到爲國家繁榮所必須的一切。我們將有原子能和許多其他的發明。」（莫洛托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十八週紀念」第三頁）。

爲要更有成效地完成這些任務，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別注意各種科學研究院的設立。日丹諾夫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九週年紀念演講中說明，現在科學研究院的數目和科學研究員人數已大大地超出戰前水準。蘇聯科學工作人員對於他們的創造活動，對於他們的新的意見，研究和發明，對於科學生產的重要建設享有空前未有的自由。我國的學者們，毅然地提高了科學生產的質量和數量，正如斯大林所說，在最近的將來他們不僅能夠追上，

而且還要超越外國的科學成就。

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選民大會上歷史性的演說中指出，復興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從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的五年計劃）祇是我國新繁榮的偉大綱領的一部分。

斯大林說道：『至于更長期的計劃，黨希望國民經濟會有新的強烈的發展，使我們工業發展水準有比戰前水準高出三倍的可能。我們必須達到的是：我們工業每年能生產五千萬噸銹鐵，六千萬噸鋼，五億噸煤，六千萬噸煤油。在這樣條件之下，我們祖國才能免於意外事件。要達到這些，不需要多，三個新五年計劃就已足夠。不過這個我們可以做，而且我們必須做到』。（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講第二二頁）。

斯大林的這些豫計乃是偉大蘇維埃國家更往前發展的指南，解決經濟主要任務——在經濟上追上和超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即每個人民所能得到工業生產品的比率上趕上與超過的方法。斯大林的方法也就是蘇聯能達到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方法。我們的領袖和教師斯大林所提出的任務將要實現。我們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有了從戰爭中鍛煉出來的並握有進步理論的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這乃是堅固的保證。

(二) 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列寧與斯大林在演講和文章中憤怒地揭露了俄國的沙皇制度，叫它是人類的恥辱，是地主——資本家惡徒們的野蠻放蕩的政體，鞭笞和黑暗的政體。

沙皇政府到它命終的最後一天還把人民大眾束縛在特殊壓迫和無權的瑣鏈之下。

尼哥拉第二因害怕俄羅斯第一次革命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曾發出宣言，在宣言上答應給予人民自由。召開立法會議，容納各階級人民的選舉，這個沙皇宣言是一個卑鄙的欺騙。勞動大眾從沙皇政府所得到的是絞死，苦役，解散工人組織，鄉村的懲罰隊，代替了自由。僅僅從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年的四年之間，在俄羅斯已有二千多人被絞死，二萬五千人被送入監獄，指派苦役和充軍。成千成萬的革命者不經過審判即被槍殺和活埋。受某種限制權利的國家杜馬，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所宣佈的「反民主的選舉法」——保證地主和大資本家在國會中佔多數的選舉法，來代替立法會議和代表會議。例如，第三屆國家杜馬（一九〇七—一九一二年）的成分：地主和資本家佔百分之五四；農民（有土地的富農）——百分之二五；而工人和小手工業者總共不過佔百分之二·五。國家杜馬的其他分子大都是沙皇官吏，僧侶代表，資產階級的律師。這種國家杜馬，當然祇是沙皇政府的工具。

沙皇制度的維護者和走狗企圖使全世界相信，俄羅斯已經「安寧無事」，它的機構業已

「革新」，沙皇政府已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一九一二年斯大林對民衆駁斥這個無稽謊言時寫道：

「請看看周圍，難道這樣受苦受難的俄羅斯可算是已革新」的，「安寧」的國家嗎？

吊殺與野蠻的橫暴政體來代替了民主憲法！

萬惡地主的黑暗的杜馬來代替了全民的國會！

十月十七日宣言上所應許的「公民自由的確實原則」——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和罷工的自由却爲冷酷的「檢查」和「阻止」，封閉報紙，放逐編輯，解散組織，逐散會議來代替了！

監獄酷刑，虐待公民，「林斯基礦工罷工的流血處罰來代替神聖的人權！」（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頁）

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和斯大林不辭疲勞地號召人民大眾爲推翻沙皇，爲肅滅資本主義來作革命鬥爭。工人與農民跟着這個號召在一九一七年推翻了沙皇，繼之而來的却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他們企圖在俄國仍保持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最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旗幟飄揚在我國國土之上。

十月革命是人民生活最偉大的事件。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經過革命而達到了消滅一切剝削肅清所有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這個目的已在我國完全實現了。

請看看我們的周圍。

蘇聯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那裏沒有老爺與奴隸，社會上沒有分爲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沒有人剝削人。

「地主階級，大家都知道，已在內戰的勝利結果中肅清了。至於其他的剝削階級，他們的運命跟地主一樣。在工業中已沒有資本家。在農業中已沒有富農階級。在商品交換中已沒有商人和投機商。因此，一切剝削階級全被剷除盡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〇頁〕。

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從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中所得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全聯邦蘇維埃第八屆非常大會所通過的蘇聯憲法中加以立法的鞏固。這憲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導師與組織者——斯大林所創造，蘇聯人民就名爲偉大的斯大林憲法。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斯大林憲法能如此徹底而完整地體現出人民的幸福與自由的最進步的思想。

斯大林憲法第一條說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爲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在從前地主與資本家所統治的舊俄羅斯地方，現在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國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大眾。蘇聯勞動階級有全權處理自己國家的運命，全國財富，人類勞動的一切

成果。

斯大林憲法第三條寫道：

「蘇聯的全部政權屬於城鄉勞動者，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實現之」。

蘇維埃政權各機關——從地方蘇維埃到蘇聯最高蘇維埃——全由勞動階級的代表，科學工作人員，著名的工人和集體農場場員，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專家、科學家組織而成。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所選出的蘇聯最高蘇維埃聯邦院的代表：工人——二八七，也即佔百分之四二；農民——一五一，也即佔百分之二二。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的六百五十七位的代表中，工人——二二四，農民——一九八，蘇維埃智識分子的代表有三五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成員中有二七七位婦女。住居於蘇聯疆土內四十九個民族代表參加民族院。

世界上任何一國沒有像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吸收這樣廣大人民大眾參預國家的管理。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所選舉的地方蘇維埃代表計有一百四十餘萬名，其中：邦蘇維埃——一〇六〇，七四六代表，鎮蘇維埃——三八，九九四，區蘇維埃——一四〇，一五八，城市和城區蘇維埃——一五一，八二二，市郊蘇維埃——八七一，州和邊區蘇維埃——九，三一。

這些代表散居於蘇聯全境——從莫斯科到最僻遠的邊區，蘇聯政府通過這些代表就能實施一切重大的政策，因為這些積極份子，老實說，已包括了我國所有人民」。(加里寧蘇維

埃國家的力量第九頁)。

若再計算蘇維埃之下的各種常設的委員會，在那裏工作的不僅是代表，而有許多公民，蘇聯政府通過這些積極分子能大大地擴大它的工作。這還不是完全的，除蘇維埃外，我國還有廣大羣衆的職工會，文化團體，青年組織，在鄉那還有集體農場和它的各種組織。單單一個職工會就有三十五萬個地方和工廠委員會，計有二千三百萬職工會會員。我們人民通過這些羣衆組織便可直接參加自己國家的事業。

蘇維埃政府乃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十分明顯的，它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不知道有什麼其他利益。蘇維埃政府及其各級機關盡力增加社會財富，堅決提高勞動階級的物質與文化水準，鞏固蘇聯的獨立性和加強蘇聯的國防。

斯大林憲法上所宣佈與承認的一切民主權利與自由，無條件地和無限制地給予蘇聯公民。

茲以蘇維埃選舉制度爲例。我們的選舉代表是全民普選制：凡十八歲以上的蘇聯公民，不論種族和民族的所屬，不論宗教信仰，教育資格，居住時期，社會身世，財產狀況和過去事業，都有參加選舉的權利，除了精神病者和被判決褫奪選舉權者例外。

這樣普遍的選舉權是任何一個，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憲法所不知道的。通常，資產階級憲法就載明許多資格，也即，他們限制人民的政權，其中如選舉權，就有許多年齡、財產、

教育和其他條件。

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家常有很高的年齡資格，因此在二十一——二十四歲以下的青年就不能參加選舉。許多國家還有住居資格的限制，也即某公民在目前選舉區未曾住滿一定時期（一年半或多些），他的選舉權即被剝奪。這樣，那些必須移地而尋找工作者，他就無權參加選舉。有些國家的選舉權還受財產資格限制，因此無產者就沒有選舉權。又有許多國家的婦女，士兵和海員都沒有選舉權。也有教育資格（參加選舉者必須受過某種教育），民族和種族等的限制。

斯大林憲法是世界史上第一個宣告給予全體公民真正的實際的民主。「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不是財產情況，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別，不是職位，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一七頁）。蘇聯與別國不同，它實現着徹底與首尾一貫的民主。

斯大林憲法給予蘇聯公民偉大的權利——勞動權、休息權、教育權、年老、疾病和喪失勞動能力時的物質保障權。這些權利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憲法不會也不會給予的。所以蘇維埃人民高傲地快樂地唱着：

「任何歲月不會磨光

這些偉大而光榮的辭句：

人們永遠地有着

學習、休息和勞動的權利。」

當在舊金山開會討論聯合國憲章問題時，主要「目的」是要解決不分種族、語言、宗教、性別以獎勵尊重人權和一切自由。蘇聯代表却提議，人類的最重要權利必須有勞動權和教育權。但藉口這些權利不大適宜，這個提議便未被通過。

否決蘇聯代表的提議，事實上說明，資本主義國家不能給予自己的公民像蘇聯勞動階級所享受的那種偉大權利。從戰爭進入到和平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大批失業。例如，美國，按照官方統計，失業人數達三百萬以上。在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復員的兵士和軍官不能找得工作。

我們看看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不會有任何的失業威脅，那裏全體公民都有勞動權的保障。在蘇聯，每個復員者都能按照他在戰事服役中所獲得的經驗與專技取得工作。而且蘇聯最高蘇維埃通告地方政府；凡給予復員者的工作不能低于他服役前的工作。蘇聯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關於復員法案，正如加里寧所說，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法案，這也無足為奇，因為它祇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立法才能擔負」。（加里寧「走向和平狀態的一大進步」真理報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

在蘇聯，民主權與自由權不僅是宣言，而實現在事實上。因此蘇聯政府給予人民大眾一

切必需的工具與條件。

例如，爲要保證公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等的民主權利，蘇聯勞動階級和他們的組織可以獲得印刷所、紙張、公共房屋等等。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大眾是不會有這些物質材料的。所以在那裏，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祇有社會上少數有錢分子才能享受得到。

茲以出版自由爲例。著名美國新聞記者維拉爾德寫道，在英國或在美國創立一個大報，必須在銀行先有一千萬或甚至一千五百萬元存款。所以不論英國或美國，一切銷路較廣的大報都是大資本家的私產。顯然，這些報紙全爲擁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爲他們的需要大胆地印發虛構的社會意見和惡意的報道。

蘇維埃民主是最完美的最高級的民主。它在原則上跟任何種類的民主不同之處，在於祇有它保證人民真正的實際的自由。

斯大林說道：『真實自由祇有在消滅剝削，沒有人壓迫人，沒有失業與窮困，人們沒有明日將失去工作、住屋、麵包等威脅的地方。在這樣的社會才有真正的，不是紙上的，個人及其它的自由』。（斯大林跟美國報紙聯合『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紙』主席 R·霍華德的談話，一九三六年第十三頁）。

蘇維埃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正如斯大林所說，蘇維埃民主不是「平常」的、「共認」的民主，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蘇維埃政權實現了列寧—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把我國變成爲最徹底，真正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我們在社會主義勝利的基礎上，創造了空前未有的蘇維埃社會的道德——政治的統一，鍛煉出來了民族間堅固的友愛，得到了熱誠的、生力洋溢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猛烈的發展。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勞動大眾的無窮盡的創造力，他們在蘇維埃國家能毫無限制地用運自己的能力和天才，提高文化水準。

在偉大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不僅改變了國家的面貌，而且也改變了人民的本身。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共同地創造了新的美好的生活，鍛煉出來了社會主義意識，友愛合作和同志間相互幫助的觀念，全民利益的崇高理解。我們人民經過內戰的炮火並且在社會主義建築年代克服了難以相信的困難，已能形成了直到目的堅韌和克服行程中的任何阻礙的技能。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的黨對於勞動階級的政治教育起了特殊作用，它用馬克思——列寧的進步理論武裝了蘇維埃人民，鼓勵他們從事勞動與偉業。

這一切在偉大愛國戰爭中更可明白見到。前線的千百萬戰士和後方的千百萬蘇維埃人民，爲保護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爲爭取在偉大斯大林憲法光耀之下的生存權，他們作了英勇的模範，令全世界驚嘆，永世不朽。蘇聯人民值得稱爲英勇民族的光榮。

「蘇維埃民主的動員力量和鼓舞建立助功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在戰爭年代特別表現得明顯

。蘇聯人民的幸福是由于十月革命使我國從衰落的次等國家中拯救出來，解脫了貴族、資本家、地主政治的枷鎖，我們人民的力量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得能空前未有的發展。所以，在我們之戰勝法西斯中，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蘇維埃民主的偉大「勝利」。（莫洛托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十八週紀念」第一八一—一八頁）。

現在，在戰後和平建設的今日，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日益提高了政治和生產的積極性，日益廣泛地展開了創造能力，努力在鞏固偉大祖國軍事和經濟的力量上直到新的成功。

（三）勞動者的福利和文化水準的增長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將自由給予勞動階級，而且也給了物質福利，富裕和文化生活的可能性。

蘇維埃政權奪取了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把工廠、製造場、土地、鐵路、銀行變為全民所有，變為公共所有。

沙皇俄羅斯時代，勞動農民總共祇有一億三千俄畝土地。蘇維埃政權取消了地主的私有土地，所有土地全歸國家所有，把從前地主，官有和寺院所有的一億五千多萬公頃的土地分給農民。在農業集體化和肅清富農階級之後，勞動農民已能使用三億七千餘萬公頃的土地了。

「剝削現象之被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中之鞏固，失業現象以及與此相連的貧困現象在城鄉內之絕跡，工業之宏偉的擴大，工人數量之不斷的增長，工人與集體農場員底勞動生產率之增長，土地之永遠留歸集體農場使用，集體農場之得到巨數頭等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供給——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更加提高工農物質狀況的實在條件。」（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五八五—五八六頁）。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增加了集體農場場員的收入。工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從一九三三年一五一三盧布到一九三八年增加到三四七盧布。集體農場場員的貨幣收入從一九三三年五十七億盧布到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一百八十三億盧布。每個集體農場農戶平均所得的穀物在一九三三年為六十一普特，到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四普特。此外蘇聯勞動階級還有的物質文化享受：休養所和療養院，幼稚園和托兒所，俱樂部和文化宮，多子女母親的補助金等等。

沙皇俄羅斯時代工農過着窮苦的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勞動階級的飲食一年比更一年好。有許多食物是從前工農所不能想像的：新鮮白脫，臘腸和菓子，罐頭——在人民食品中已佔主要地位。工人和職員在一九三七年所消費的牛油要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倍半，豬肉——增加三倍半，臘腸增加四倍。集體農場場員所消費的肉類，在第二五年計劃幾年中，要增加二·三倍，油增加二·八倍。

蘇聯勞動階級所需要的日用消費品一年比一年增加。日用消費品工業一九三七年所生產的要比一九三二年超過三倍。在兩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實際上創設了不少新的製鞋，縫衣和織物等工業部門。一九一三年總共不過生產了八百三十萬雙皮鞋，而蘇維埃皮革工廠一九三七年則出產了一億八千二百九十萬雙皮鞋——多了二十二倍。由於人民的富裕和文化水準的提高對於這些生產品的需要也大大地增加。例如，集體農場場員得到的織物，皮鞋，套鞋和其他產品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要增加三倍。

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大大地改善了勞動大眾的居住條件。在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黨大會上，斯大林說道：

「我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面貌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及國家各大城市所不可避免的，就是那些破亂矮屋，那城郊一帶的所謂工人住區，是黑暗的潮濕的破落不堪的處所，大半都是地窖，其中的居民照例都是一些輾轉於污泥，埋怨厄運，吞聲叫苦的窮人。而在我們蘇聯，由於革命的結果，這種破亂矮屋已經絕跡，它們已被新建的美麗的光亮的工人住區代替，而且我們許多工人住區往往比城市中心還美觀得多哩。」（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五七頁）。

我們的鄉村和小鎮也有極大的改變，那裏出現了許多公共事業的建設，俱樂部、電影院、學校、圖書館、托兒所。

沙皇俄羅斯也是文化上落後的國家。一九一四年識字人數總共不過百分之三三。蘇維埃政權時代全國實行了真正的文化革命。蘇聯已成爲全體識字的國家，普遍國民教育的國家，大學和高級專校的國家。一九三九年在蘇聯各級學校求學的學生計有四千七百餘萬人，而革命前僅有八百萬學生。一九一四—一五年受高等教育的祇有十一萬二千人，而且勞動階級根本沒有入學的資格。一九三九年在蘇聯大學和高級學校求學的學生達六十萬人以上，這比全歐二十三國，包括英、法、德和意在內的高級學校的人數還多。

『由於這個巨大文化工作的結果，於是在我國就誕生了和形成了衆多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這個智識界是由工人階級，農民，蘇維埃職員隊伍中出身的，是和我國人民彼此血肉相連的這個智識界是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剝削的枷鎖，而是仇恨着剝削者，並準備忠誠效勞於蘇聯各族人民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八九頁）。

蘇維埃政權極注意保護勞動階級的健康事業，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的醫藥設施。沙皇俄羅斯時代，每年每個人民的保健費用總共不過六十九個戈比，一九三七年每人的健康費已達六十盧布十六個戈比。

蘇維埃國家非常關懷母性和小孩。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所頒布的『增加國家對於孕婦，多子女母性和孤獨母性的幫助，加強保護母性與子女，規定光榮稱號——「母性英雄」和「母性之光」和「母性獎章」等勳章』的立法便是這種關懷的明證。甚至在社會主義國全力應

付空前未有的大戰時期，蘇維埃政權還盡可能地用大量金錢幫助孕婦和母性以及兒童教育。

人民的物質生活的改善使我國人口大增，死亡減少。從一九二七—一九三八年的一十二年間，蘇聯人口已增加百分之五·九，多於任何國家，在同時期內，亞洲的人口總共不過增加百分之八·七，美國——百分之二·一。蘇聯人民的死亡比沙皇俄國減低百分之五五。同時，蘇聯人民的生產數多于死亡數的比率，比英多三倍以上，比美國幾乎多四倍。

蘇維埃政權給蘇聯勞動階級展開了富裕和文化生活的廣闊大道。

蘇聯新生活跟舊生活不同，正似白天不同於黑夜，光明不同於黑暗。

請看看蘇聯的人民，工廠與工場，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

莫斯科「膠皮廠」的一位老工人謝里諾夫，他年青時因難而痛苦。十月革命前他曾在酒店當學徒，受盡了侮辱，輕視，毆打。

謝里諾夫說道：「偉大十月革命之後，我的生活根本改變了。最初我在工廠做個普通工人。我耐心地學習了技術，一九三一年我就加入了技師班。我自己教導青年，一九三九年因為多年的勞動，因為教導高級熟練工人，因為積極參加合理化事業，政府獎給我列寧勳章，在蘇維埃政權時代，我不僅能在自己的工廠裏獲得有成就的工作，且能參加國家和社會事業。我是區蘇維埃代表，蘇俄最高法院的人民陪審員。

莫斯科的魯哈維茨區，留皮切村住着一個集體農場員葉卡特林娜，他的過去生活痛苦

而沒有安慰。他僅幾歲時就給商人沙白基當婢女，後來做傭佃農，小船上背貨，生活赤貧而飢餓。特別在第一次大戰時受盡了苦難，那時她的丈夫被徵入役，她還得扶養二個小孩，祇有在蘇維埃政權時代祇有在集禮農場組織之下葉卡特林娜才嘗到真正的人生滋味。現在葉卡特林娜已爲全國所周知，她是全聯邦畜牧業社會主義競賽的發起人。她是全國最優秀的榨奶婦，她能在每只喂粮秣的牝牛上榨取七千公升牛奶。葉卡特林娜是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的胸前掛着列寧勳章「光榮章」和「母性之光」等獎章。

十月革命前，郝魯道夫工廠，現改名爲「無產階級領袖」（在莫斯科州伊哥爾夫斯克），紡織工人的生活痛苦而艱難的，工人們居住在污穢，潮濕地窖或小屋裏。有位年老伊哥爾夫斯克紡織女工拉普夫說道：

『生活得令人憎惡。工人家庭住在木製的小房裏，這是被薄板隔開的小角。每間房屋住着三個家庭。眠床很少，確實也無處可放，所以每只床不會閒空；家裏某個人出去工作，另一個人就睡在那裏。小孩們就睡在地板上，他們又骯髒又襤褸。』

這種惡夢似的生活永遠消失了。在從前地窖小舍地方建起了好幾層樓的高大優美的住宅。從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的十年之中爲建築宿舍已化了六百萬盧布。又建設了俱樂部，技術學校，八個幼稚園。

莫斯科州，德米特羅夫區，郝斯達西鄰從前農民的生活也貧窮而困難。每農戶祇有一

一·五公頃土地。在這小塊土地上還得劃分為種植裸麥、燕麥、大麥和馬鈴各部。德米特羅夫區土地每公頃祇能出產五十六，最多七百磅穀物。

現在娜斯達西鄉農民的生活則完全不同了。他們的「勝利」集體農場收成之高為全國所周知。貧窮的娜斯達西鄉一變而為富裕的文化的村落，那裏再沒有一所草屋。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我國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而美麗，快樂而幸福。按照第三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預定人民的消費品要增加一·五—二倍，國家對於城市和鄉鄉勞動階級文化生活設施的支出將增加一·七倍。蘇聯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有成效地執行了第三次斯大林五年計劃，但是他們的和平工作和物質生活的提高却因為希特勒德國強盜的侵略而中斷。

在大戰的峻嚴的日子，蘇聯勞動階級特別深刻地感覺到蘇維埃生活制度的可貴。

在高爾巴多夫的小說「戰士古里哥夫」中，講到我們蘇聯戰士有一次進了一所被德國人破壞掉的產科院裏，因為興奮而顫動站在被破壞的兒童用的床邊。那時古里哥夫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築得多麼舒服呀！假設妻子分娩有醫院，子女讀書有學校，種子的選擇有實驗室試驗，春天時修理拖拉機有拖拉機機器修理廠。」

成千成萬蘇聯人民都有同樣的思想。他們之中的每一個愛護自己蘇維埃祖國的感覺無窮盡地增加着，對於擊毀敵人更堅決地供獻一切的力量，必要時，願獻出所有的生命。

戰爭幾年中使蘇維埃人民遭受着無窮盡的困苦和災難。不過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我們得了勝利，保衛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和祖國的自由和獨立從西方德國強盜和東方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中救出了祖國。

蘇聯人民在不屈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展開了我國新的偉大發展和蘇聯人民生活水準更向上提高的大道。

蘇聯人民深知，我國走向新的繁盛大道，必須克服因戰爭而產生的許多困難和遭敵人佔領區域的聞所未聞的破壞。除了這些困難之外，還有一九四六年在我國許多地方的旱災和荒年。工人、職員、農民忍受着供給的限制，爲共同事業作了嚴重的犧牲。

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用盡全力減輕勞動階級的境況，運用各種方策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由於某種配給品的價格略有提高，政府立即決定增加工人和職員的平均工資。

蘇聯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肅清集體農場內那違反農業組合法規之方案的法令，使集體農場事業建立在新的階級上，並保證集體農場更加堅固。

政府關於「發展城市與鄉村的糧食和工業品的合作社商業，增加合作社的糧食日常消費品的生產」的法令也是可證明蘇維埃國家關心滿足自己人民物質生活需要的一件事實。

城市和鄉村合作社商業的發展和擴大商品流通的補充資源改，善着對人民的糧食和工業品的供給。商品流通的擴展能鞏固盧布市價，提高工人與職員的實際工資的水準。

我們所經受的困難是短期的，暫時的性質。蘇聯人民用不着害怕明天。在蘇聯沒有也不會有經濟恐慌和失業。按照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實施方案，蘇聯勞動階級生活水準將不斷地提高。

五年計劃預計發展農業經濟和消費品生產的工業部門，使國家創造了豐富的基本消費品——麵包、肉類、動植物油脂、糖以及其他的消費品。大量地增加織物、衣服、皮鞋、傢俱、文化和家庭所需要的各種用品。國家對於城市和鄉村人民文化與生活需要的支出（政府對城市的建築費用不包括在內），到一九五〇年將增加到一千另六十億盧布，這要比一九四〇年高出二倍半。

蘇聯人民知道，新斯大林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他們的生活將比戰前優越。蘇聯人民沿着列寧—斯大林黨所指示的大道，往前進行，將達到，國家有豐富的消費品，我們將有豐富的生產品可從社會主義進入到共產主義，進入到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主」的生活

斯大林說：「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在像蘇聯這樣的一個國家中」。（斯大林答「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惠爾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給斯大林的短簡中所提出的問題）。

(四) 自由共和國的堅固聯盟

人們稱沙皇俄羅斯爲「民族的監獄」。俄國的許多非俄羅斯民族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遭受了殘酷的剝削，毫無權利。沙皇政府公開稱邊疆主要民族是「異族」，窒息他們的民族文化的一切表現，禁止非俄羅斯民族在學校裏用民族言語教育。沙皇制度對待許多邊區好如殖民地，阻止他們的經濟發展。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改變了俄國民族的情形，它確定了俄國所有民族的完全平等，取消了所有的及各種各類的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任何特權與限制。列寧和斯大林所宣佈的新的，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即以彼此合作和互助的原則爲基礎我國各民族間友愛和親密的政策來代替舊的沙皇的資產階級的政策。一九二一年第十次黨大會上斯大林指出，蘇維埃政權在民族壓迫剷除之後的任務是肅清從前被壓迫民族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落後性。大會對斯大林演講通過的決議說道：

「現在，當地主和資本家業已被顛覆，而這些國家的人民大眾已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之時，黨的任務就是要幫助非俄羅斯民族的勞動大眾追上先近的中央俄羅斯，幫助他們：（1）發展並鞏固他們的蘇維埃政府組織，適合這些人民的民族—生活條件；（2）發展並鞏固他們採用民族語言的裁判所、行政機關、經濟機關、蘇維埃政權機關，並且這些機關應由

熟知地方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的本地人士組成之；(3)發展他們採用民族語文的出版、學校、劇院、俱樂部事業和一般的文化——教育機關；(4)用民族語文設立並發展廣泛的普教通育的和職業——技術性的學校與訓練班網（首先爲吉爾吉斯人、巴什基爾人、土克曼人、烏茲貝克人、達吉克人、阿塞爾拜然人、韃靼人、達格斯坦人，以便加速培養當地人民的熟練工人和蘇維埃——黨的各種行政方面的，首先是教育方面的工作幹部）。『聯共的決議』第一部第三八五頁 一九四〇年版）。

蘇維埃政權實現了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創造了堅固的，不可破壞的多民族的國家並領導蘇聯所有民族走上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大道。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羅斯民族權利的宣言』中宣布了，俄羅斯民族的平等和獨立，他們有自由的自決權甚至有分離與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在蘇聯國土上已成立了六個獨立的蘇維埃國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爾拜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在內戰幾年中這些共和國人民圍繞在他們的大哥——俄羅斯人民密切地團結着，共同地作戰反對國內與國外的敵人。蘇俄與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簽訂了軍事——經濟的合作條約。

一九二二年當全蘇維埃國土上已肅清了干涉者和白衛軍時，就發生了更緊密的聯合蘇維埃共和國成爲一個聯盟國家的問題。這對於用共同的力量組織堅強的國防，聯合所有人民的

力量以建設社會主義，在經濟和文化互相扶助的原則上保證各民族的全面發展是很必要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在全蘇維埃聯盟第一屆大會上提議，創立了蘇維埃人民自願聯合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

被解放各民族統一的友好的聯盟，代替了沙皇俄羅斯，代替了這極度的民族壓迫的國家。

蘇聯的形成乃是列寧——斯大林黨的民族政策巨大的勝利，乃是偉大俄羅斯民族的偉大成功，在它周圍密切團結着的蘇聯的一切民族。

蘇聯最初的聯盟是四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由阿塞爾拜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所組成）。那時蘇聯人口爲一億四千萬人。

現在蘇聯已聯合了十六個權利平等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貝克，卡薩赫，喬治亞，阿塞爾拜然，立陶宛，摩爾達維亞，拉脫維亞，吉爾吉斯，達吉克，亞美尼亞，土克曼，愛沙尼亞，和卡累里阿——芬蘭等共和國，在大戰以前計有人口一億九千三百萬人。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中，我國從前落後的邊區民族走上了巨大發展的道路：在極短的期間出現了高大的工廠烟囪，電站大放光明，拖拉機和聯合機騷動着，開設了幾百所小學校和技

術學校，幾十所高級學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卡薩赫勞動階級寫給斯大林信上說道：

「在蘇維埃政權之前，我們人民的生活好如春天沒有花木，白天沒有日光，江河沒有泉水。地下豐藏着貴重的五金，而人們却用木犁耕草地。山地北河的生命之水充滿了湖沼和江河的豐盛的沿岸，而人們却死于乾渴。嚴冬的時候，冰雪遮埋了牧場，遊牧人民的牲畜——生活的唯一靠山——因飢餓而死亡。穿過這個閉塞的國家需要數月或半年。人們由出生，活着而死亡，從未會見到世界上的美好生活。」

蘇維埃政權，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黨給予了卡薩赫人民新的偉大的，快樂而幸福的生活。

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二十五年之中創造了前進的工業卡拉甘達煤礦每年出產着百萬噸的煤。列寧諾高爾斯克和契姆甘特的鉛，巴耳哈雪，伊爾脫雪，加爾沙克巴伊的銅以及其他工廠供給了我國國民經濟的有色金屬。在卡薩赫建築了西米拍拉丁肉類罐頭廠，古里也夫的魚類罐頭工場，阿克撈賓化學廠和其他許多工業企業。順利地發展了石油工業。在蘇維埃政權時代，銅的產量增加了二十三倍半。煤油產量增加了二十六倍，鉛的產量則增加好幾百倍。好幾百萬公頃的不毛之地變成了種滿甜菜的肥田、棉花田、菓園和葡萄園。在共

和國的集體農場的牧場上畜養着一千五百萬頭的牲畜。

在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發展了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之前該共和國祇有百分之二是識字的。而現在已有七七三五所國民小學和中學，二十二所大學和卡薩赫科學研究院。卡薩赫的文學和藝術順利地發展着。增加了許多民族知識份子幹部。

還有一個例子。

在現今的土克曼共和國國土上，在革命之前祇有幾個小學校，沒有一個高等學校，也沒有一所戲院。而現在該共和國已有七所大學，三十九所技術專門學校，一千另五十二所小學和中學，約有四十所科學研究所和蘇聯學科院在土克曼的分院，十四所戲院，音樂院，二十九個電影院。

沙皇制度下被侮辱的束縛勞動者，飢餓而無權的奴隸已變為蘇聯的自由公民，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權主人。

所以烏茲貝克人民表示蘇維埃所有人民的感覺時，在他們的歌中唱道：

朋友們，讚美吧！

我有現在自由也有光榮，

在工農的國家裏面，

我也有保護和「權利」。

老江布爾說道：

卡薩赫人，伸直你的背，

眼睛中感到了太陽！

因此，自由的蘇維埃共和國跟偉大的俄羅斯會有如此堅固而不可破壞的聯盟。

愛好和平而英勇的俄羅斯人民不僅幫助了我國所有各民族解脫了民族壓迫，並且還幫助他們建設新世界——真正自由而幸福的世界。在偉大的愛國戰爭時間，俄羅斯人民堅信蘇維埃政府政策的正確，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證擊毀希特勒德國，領導蘇聯所有各民族為祖國自由獨立作戰。蘇聯所有各民族的英勇的子女自願地投入紅軍。他們好似同胞兄弟保護自己的大家庭——偉大的蘇聯。

德國法西斯黨徒們企圖拉回歷史的車輪，擊敗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他們用厭惡人類的「人種論作理論的工具，以創造『優秀的日耳曼民族』統治被奴役民族的道德——政治的前題。這個生番的政策遭受了完全的毀滅。敵人不能分化蘇聯人民間的友愛。德國法西斯黨徒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偉大的愛國戰爭，我們不僅在軍事與經濟上戰勝了法西斯，並且在思想上得了勝利。

斯大林說過：「我國所確定的各種族和各民族的同等權利的理論，人民間的友愛理論完全戰勝了希特勒的殘忍的民族論和憎恨的種族論。」（斯大林『蘇聯偉大的愛國戰爭』第一

四三頁)。

在戰爭過程中，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更趨堅固。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關於創立聯盟共和國和軍隊編制和聯盟共和國外交關係方面的全權代表的法案，這是可表現聯盟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這是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新的勝利。

現在許多加盟共和國已登上世界舞台。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許多加盟共和國已跟外國發生文化關係。

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保證蘇聯國民經濟更往前發展，也就是保證各加盟共和國的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

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新五年計劃預計許多加盟共和國的工業投資，相對地高於蘇聯的比率。例如，蘇聯工業總生產產品，到一九五〇年要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四八，而達吉克却要增加百分之五六，土克曼增加百分之七云，卡薩赫、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要增加二倍以上。這是領導我國從前經濟較落後的區域更往前發展。

根據五年計劃預計，摩爾達維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工業生產品要比一九四〇年水準大大地增加到百分之七八——二〇〇。這些共和國加入蘇聯的親愛家庭是在偉大愛國戰爭的前夜。蘇維埃政府，共產黨把幫助青年的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創立經濟與文化迅速發展的基礎作為自己的任務。

五年計劃的法案保證被戰爭損毀的區域和共和國巨大復興工作。規定從二千五百億盧布的總投資中支出一千一百五十億作為該項工作之用。我們強有力的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來幫助這些遭戰爭災害的區域和共和國的經濟與文化的復興。

俄羅斯聯邦在全蘇聯國民經濟的發展上和它的強大的國防力量的繼續鞏固上初居於領導地位。前五年計劃末年俄羅斯聯邦的工業生產量要比戰前增加一倍半。在蘇俄的土地上創造許許多多新的冶金業和機器製造業基地，擴大煤和石油工業。東部西伯利亞和遠東將成為強大而高度發展的工業中心，有新的鐵路貫通其間。

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的五年計畫乃是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基于彼此合作和互助的蘇聯各民族間友愛而親密的政策的表現和更往前的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勝利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到空前的高度。

斯大林說道：『法西斯的根據地 and 世界反動勢力的根源地位粉碎和剷除深刻地改變了世界人民的政治生活，在人民間廣泛地發展了民主運動。人民大眾由戰爭所得的經驗，知道國家的運命決不能交給那追求反人民的渺小階級性的貪慾目的的反動統治者。正因為這了，人民再不願意過着舊的生活，他們把自己國家的命運握在自己手裏，建立民主秩序，積極進行反抗反動勢力的鬥爭，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全世界人民決不願意重復戰爭的災厄。他們堅決地爲鞏固和平與安全而鬥爭。

蘇聯是爲和平與安全鬥爭的先鋒，在粉粹法西斯主義上會起了傑出的作用，它已完成了偉大的解放的使命。（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蘇聯武力部的指令）。

蘇聯徹底地堅決地創立鞏固的，長久的，正義的民主世界的事業，鞏固國際間的合作的偉業，所有各民族——多數和少數的，都有權根據民主原則建立自己的生活。所有先進的進步的人們都知道，蘇聯乃是各民族和平與安全，自由與獨立的確實的支持者。

蘇聯政府的高尙的外交政策完全適合我國基于各民族間友愛和親密的原則，這個政策使蘇聯勞動階級的心，因爲自己社會主義祖國，因爲自己蘇維埃政權充滿了高傲。

斯大林說過：「在世界上沒有，也根本未曾有過像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有力的和權威的政權。世界上沒有，也未曾有過，像我們共產黨這樣有力的和權威的政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〇八頁）。

蘇維埃政府的力量與不可戰勝是在于他跟人民大眾有密切的堅強的聯接，他做了人民的親屬和密友。

蘇維埃政府的力量與不可戰勝是由于在蘇維埃國家的領導核心是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黨——蘇維埃人民最先進隊伍，他的政治領導，「我們時代的智慧，光榮與良心」（列寧）。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空前未有政治高潮中進行的蘇維埃的選舉，蘇維埃人民全體一致贊成共產黨和非黨員聯合的候選人。全體參加選舉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贊成他們。這是我們自己向全世界表示蘇維埃政權的力量和我國民族間不可分離的一致和友愛，表示無限信任和無窮忠于布爾什維克黨，偉大領袖和勞動階級的導師，全世界——歷史勝利的創造者，親愛和敬愛的斯大林。

蘇維埃國家各民族間的和友愛和親密是堅固和不可破壞的！

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克黨對於我國人民愛護和忠實是深刻的無窮的！

熱烈的生氣勃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鼓舞了並將永遠鼓舞着蘇聯人民從事英勇偉業和增加可愛祖國的光榮！

以布爾什維克黨為首，在斯大林領導之下的蘇維埃人民走向蘇聯共產主義完全的勝利。

蘇聯國家政權的高級機關

法學碩士 A·A·阿斯凱洛夫

蘇聯人民，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的創造者，已實現了人類優秀份子關於公正的人民政權的幻想和希望了。佔有地球面積六分之一，而人口有人類十分之一的大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地體現了勞動大眾的意志，願望與憧憬。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是多民族的蘇聯人民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民衆意志的直接的代表者，與成千百萬工農知識份子大眾血肉相親的政權。

在蘇聯國家之中，自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開始已奠定了人民的絕對全力的政權。蓋國家政權本身，就其任務而言，就其內容抑或就其實現的方式而言均有不同，已轉入領導一切勞動大眾的工人階級之手，即轉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之手。

(一) 蘇聯國家政權的統一性及其民衆性

國家政權，爲握在國家手中而由國家機關實現統治階級利益的集中的社會的強制。每一個國家，由其機關爲代表，具有一種權力的本性，即是說，具有一種能力將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爲對全社會的當然的意志，將這種意志載入憲法之中並強迫執行其命令。如無權力，國家即不堪設想，它是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國家對社會的領導）。但國家政權如不以國家機構

及強制機關爲憑依是空洞無物的。國家政權與其它各種沒有特設強制機關的社會權力（如民族的，家族的以及企業領導者的生產組織權力）的不同就在這裏。

國家政權，不論在中央及地方，均通過復什的國家機構，經過國家機關的體系來實現。蘇維埃政權，在它的內容與形式上，均爲真正人民的，最民主的，因爲國家政權完全全屬於全體蘇聯人民，屬於以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爲代表的城鄉的勞動人民。

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政權的區別，不祇是說，它完全不是強制的，而且是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大衆教育的工具。在蘇聯，國家政權命令的執行，視公民覺悟及遵守紀律的程度而定，同時對於人民中的絕大多數是自願的執行，而不需採取強迫的手段。祇有在個別公民不欲服從國家政權的命令的特別的情形下，國家機關得訴之於強制的手段。

在蘇聯的國家政權，不僅要調劑政治的關係，而且要指導國民經濟。蘇維埃制度與那種通常純然祇局限於行政活動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制度的一個根本的相異之點，就在於這種政治經濟領導的結合上面。

蘇聯的國家政權制度，將施政的代表形式與直接的民主聯結在一起，即與實現勞動者自身的國家政權方面的完全而直接的決定性的參加聯結在一起。

作蘇聯代議制的基礎的，就是列寧的這個命題，他說：「每個羣衆的代表，每個公民，均必須有這種條件使他能夠在討論國家的憲法時，抑或選舉他的代表和執行國家的法律時來

參加。」（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二〇頁）

蘇維埃政權表現出了蘇維埃社會的完全統一。這種統一性，在基本上，第一、它表現在城市和鄉村勞動大眾利益的共同性上，表現在無敵對階級存在的蘇維埃社會的偉大獨一性上；第二、它表現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解放出來的蘇聯各族及人民的團結性上，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不和與齟齬；第三、表現在整個國家之目的與地方需要及利益的相合一致上；最後，表現在蘇維埃制度的一切環鍊上，在蘇聯國家之中，統一而唯一的政黨，聯邦共產黨（布）在領導着蘇維埃制度。

蘇聯人民的絕對的全權，體現在蘇聯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之中。一切政權全部的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最高機關，決不是排除了蘇維埃國家地方機關權力的真實性。在一切環鍊上，勞動人民代表的地方蘇維埃，直接地表現出了人民的意志，並在它管轄的區域之內以及在它的權力範圍之內，代表城鄉勞動人民及受其委託而實現其政權。民主集中制，為蘇維埃領導的基本的組織原則，它意味着一方面這是全國的利益與集中的領導二者與另一方面、地方的利益，對地方特性的完全的估計以及民衆自動性發展的和協的結合。

蘇聯國家政權的統一性，決不會與一九三六年所頒佈的蘇聯憲法所承認的統一的國家政

權各級機關所享受之嚴格而明確劃分的全權相矛盾。

蘇聯國家政權的統一性，是以它集結在人民手中爲出發點，消滅了立法權行政權以及司法權彼此之間的任何一種矛盾，現象。所有這一切政權的形式，不過是統一的蘇維埃國家政權的種種表現而已。國家政權的各種機關亦與這種種的形式相適應。國家政權完全全由最高蘇維埃行使之。立法權，最高領導權以及最高監察權純然由最高代表機關最高蘇維埃行使之。然而國家政權並不是囊括了這許多職務。它或以執行法律的形式來行使，或依法將全權付託政府及其它行政管理機關行使之。最後，國家政權亦以法庭對犯法者的採用法律的形式抑或檢察官爲代表的集中監視遵守法律的形式行使之。

這樣看來，國家政權的統一，先應對其所屬各級機關之間的權力來一個嚴格的劃分。這種劃分表現在：第一、立法權祇是集中於最高的代表機關之中，而行使對國家的全部的最高領導權；第二、最高管理，司法以及監察等機關的設立以及此等機關依法對民意的服從，這些機關對最高蘇維埃的責任。

列寧斯大林關於國家的學說以及蘇維埃國家的實踐，均駁倒了「分權」的原理，駁倒了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權分立以及均衡的思想。

英國哲學家洛克最早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後來又由法國有名的法學家孟德斯鳩加以研究。孟德斯鳩的理論，在當時變成一種解決資產階級貴族雙方和他的專制君主之間關於政權爭

論的調和手段。

孟德斯鳩認為除君權的限制而外，權力的劃分必須保證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及個人在國家中的權利。

孟德斯鳩曾宣傳立法行政兩權彼此獨立的思想。可是對立法權是不利的，雖然它被宣佈為政權的最高形式。根據孟德斯鳩的理論，其原意的理解是：行政權在立法範圍用法律上所載的「否決權」的行使以阻礙立法權是正當的，但是立法權却享受不到權利去干涉行政權的行使，如果不將部長因違背法律而控訴於法庭的形式上的權利算在裏面。

十九世紀前半期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將三權分立說與議會政治的原理結合起來了。但在事實上，所謂獨立，在議會國家中成為行政權的優先權利，在理論上亦建立在「分權」原理上。

馬列主義的經典暴露了「分權」論的真諦，同時指出，第一、為它的虛構性，第二、為它真實的服務作用，因為「分權」的原理，是為貴族的利益限制了議會的權力，所以它亦為資產階級國家所擁護。列寧寫道：「真正的（國家的）工作，由內閣各部，首相及司令部背着（議會）來作並完成。」（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〇一頁）。

馬克思與列寧批評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形式性及其實現民主主義時的折中性，批評成它所包含的那種有限制的民主。他們指出，脫離被選的代議機關的行政權的獨立性以及警察

官僚機關的毫無拘束，事實上是完成着所有實在的國家的工作，差不多是使議會的權力化爲烏有，抑或變爲空虛。資產階級的民主常常不免地將名義上由代議機關所執行的立法工作與行政工作分裂爲二，前者（即代議機關）其中大多數由享有特權的代表及職業政客所組織，而後者（即立法機關）則不啻享有特權的官僚，這些官僚，就其本性而言，是與統治階級雙生合胞的，即是說，與少數統治的人雙生合胞的。

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事實上爲有產階級政權的形式，它祇給予人民某些非常有限的自由及權利。但資產階級形式的議會政治亦不消滅官僚主義，政黨輪流當政，而官僚主義則仍繼續作威作福。議會所以沒有握到真正的權力，是因爲甚至立法權亦不由它操縱。

我們可以舉出人證以證明之，這個人決不是傾向共產主義，而是道地的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即聞名的自由主義者拉姆塞·繆爾。他寫過這樣的話：「官僚政權，不祇散佈到行政方面。而且也蔓延到立法及財政方面。官僚政治不單是執行法律，而且在許多場合還製定法律，它不祇是花費稅收，而且往往釐定應徵收多少租稅，並應如何去徵。」

蘇維埃制度不知道議會民主制的罪惡，因爲它把立法工作與行政工作結合起來了。蘇維埃不獨由其最高機關爲代表去立法，而且它也由它的中央及地方機關爲代表去指導行政機關的活動。它通過它的代表們，委員會以及積極份子們去組織法律及其議案的行使，從而日常不斷地吸收人民大眾去參加國家的管理。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代議機關「仍然存在着，然而特種制度的，立法與行政分工的議會主義，……在這裏却無存在的餘地」，這是列寧講過的（見俄文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〇二頁）。

（二）蘇聯最高蘇維埃為蘇聯人民的最高代議機關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意味着國家一切政權向工人階級手中的轉移。在新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之中，最高政權從最初一天起就集中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和由它選舉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手。

在蘇維埃國家之中，最高政權機關的階級內容，過去是，而且永遠是工人階級專政，但這種工人階級專政，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它的基礎，一向是，而且將來仍是國家政權組織的蘇維埃制度，唯一適合於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本性的蘇維埃制度。本身體現了城鄉勞動大眾政權之統一與主權的蘇維埃，乃是與人民最接近的民意機關。它「是真正而實在的最高的國家機關」（列寧語）。在蘇維埃國家當中的最高政權的內容和階級的本質，在它全部的很長的歷史上是沒變更過的。至於它組織的形式，則每因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發展而改變。自蘇維埃政權建立之日起，就會對統一的國家政權各級機關之間的權限加以某種劃分。其特徵是把最高政權集中在最高的蘇維埃代議機關手中，而對於國家的直接的管理，則集中

於人民委員會。然而，這種權力的劃分，在蘇維埃國家發展的第一階段的歷史的條件下，却不可能貫徹到底。當時行使立法權的，有幾個最高的機關：不僅蘇維埃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立法權，而到後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亦行使之，甚至人民委員會亦行使之。這種程序，是因那個時期政治環境的特殊性決定的。與勞動者之敵人——資本人、地主及販賣自己祖國而幫助德國軍隊及其他干涉者的富農——所進行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隨着環境的需要，要求迅速地通過法律，而不需要等待代表大會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例會的召集。但不是說，這樣一來便削弱了代議機關的權力，因為它還是完全掌握着它對行政機關的管制及領導。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保證了向蘇維埃國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的過渡，造成了一個條件以改變最高國家政權的組織系統。其組織方式及其活動的程序變更了，蘇聯最高政權機關之間權限的劃分亦起了變化。跟着蘇維埃國家職務的復什化，以及爲了鞏固法律及社會主義法則的穩定性，於是產生一種必要將一切立法權操之於一個機關手裏。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全聯邦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曾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着重指出：「最後，應當是消滅那種不由某一機關而由若干機關立法的狀況」（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三〇頁第十一版）。所以一切立法權便集中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手裏。將屬於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最高的領導權，最高監察權以及立法權的行使而與蘇聯政府所實現之執行及管理的活動權嚴格

劃分。這個是說明了蘇維埃制度組織能力及民主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

(甲) 蘇聯最高蘇維埃——蘇聯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蘇聯最高蘇維埃，爲最高的代表機關，直接由全體蘇聯國民按照普選的，平等而直接的選舉權的原則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下選出之。它握着蘇聯的全部國家政權。它反映了蘇聯人民的主權，他的意志及其全權。蘇聯的立法權無例外地由蘇聯最高蘇維埃所行使。這是在蘇聯境內決無其它任何一個機關享有頒佈全聯邦法令的權力。

可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不僅是一個立法機關。根據蘇聯憲法第十四條，它享有屬於蘇聯的一切權力，因爲這許多權力並不劃歸向其負責的蘇聯各機關。

蘇聯最高蘇維埃領導着向其負責的蘇聯諸最高機關的活動，設立這些機關，由它規定管理的組織原則，監察它們的工作。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最高法院，組織蘇聯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任命蘇聯檢察官。蘇聯最高蘇維埃實爲這一切機關分子權力的直接的泉源。它指導它們的活動。

(乙)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兩院機構

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兩院組成之，一爲聯邦院，二爲民族院。

蘇聯最高蘇維埃內兩院的設立，表現它爲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最高形式，並且顯示出了

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獨一性。對國家的至上的領導以及蘇聯法令的頒佈，是以蘇聯一切勞動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及每一民族之中勞動人民特殊而固有的民族利益和以蘇維埃國家人民爲出發點而實行的。這個使鞏固了蘇聯各族人民相互的信任與友誼互助及合作，充分保證了住在蘇聯境內的各民族的和平與統一。正是爲了達到這些目的，所以才需要民族院，以反映蘇聯公民特殊的民族利益，以保證這些利益的被加以慎重考慮。斯大林會說，這種機關，無條件地是用得着的。他說：「用不着懷疑，沒有這種機關，不可能治理蘇聯這樣多民族的國家。這種機關，就是第二院，即蘇聯民族院」（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三〇頁第十一版）。斯大林憲法提高了這種第二院的地位及比重。自斯大林憲法制定後，第二院即在蘇聯最高機關，即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之中內馬上成立了。

兩院的權力平等，是蘇聯兩院制的基本原則。兩院權力的平衡，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是用這樣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起來的，第一就是兩院人數的相等（但根據一九二四年的蘇聯憲法，聯邦院計有六百人，而民族院祇有一五〇人）；第二就是兩院都是根據同一原則選舉，按照選舉區由公民直接選舉。

再則，兩院權力的平衡，還表現在它們對立法創制權的平等，它們所享受的全權的同一期限，兩院會議的同時召開，對問題之討論及解決的平行並進及同一時期性，各院的必須分別通過法律，但如法律是在兩院的聯席會議通過，則必須按各院的人數分別投票，在兩院召

開的聯席會議上，兩院的主席輪流担任大會主席。

蘇聯憲法第四十七條，亦爲兩院平權的重要的法律保障，這一條規定出了解決兩院爭執的辦法。遇有兩院發生爭執情事，兩院即根據平等的原則組織一共同的調解委員會。如該會未能折中解決，抑或其決議未能獲得其中某一院的滿意，最後這個問題還是第二次提交兩院。再如兩院二次未覺得折中的決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即下令解散蘇聯最高蘇維埃，並限令於兩個月之中進行新的選舉。那時，爭論的問題由民意的表示及選舉的結果解決，換言之，用唯一澈底民主的方式以解決兩院無法調解的爭論。

在蘇聯，已實現了蘇聯各民族人民共同利益及個別利益的統一與和協。所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兩院之中，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發生利害的衝突。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兩院制，建立在民族平等原則的澈底執行上面，同時也是在蘇聯國家範圍內民族國家生存完全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證之一。

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兩院制是完全另一種內容。資產階級兩院制的階級本質，是與資產階級的歷史、它的目的以及其使命聯系着。在歷史上，這種制度，是封建的等級制度的殘餘，在這種制度下，代議機關是按等級的原則而建立。結果，上院便被資產階級所利用以作爲某一種障礙物去抵制下院選舉中可能發生的一切意外事件。

上院幾乎完全不在乎人民的投票選舉，因爲它或則是按照指定，或世襲的原則組織，或

則是利用不民主的選舉法產生的（對選舉人而特別是對被選人年齡的提高以及間接選舉法）。它是最反動的，而且通常是與大地主貴族相依爲命的金融資本巨頭直接的工具。如果下院有進步的色彩，上院對下院所通過的法案便常常加以保留或引用「否決」權。

上院的存在，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之中，是與民族的代表不相關聯的。上院缺乏存在的明顯而令人信服的必要的動機，引起了許多進步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及政治家方面對兩院制思想本身的激烈的批評。舉例來說，英人赫爾寫道：「一旦有兩個代議機關設法，同時一旦其中有一個是依照健全的原則，那麼另外一個，不論它與前一個有何不同，一定是違背了這個原則」。

（丙）蘇聯最高蘇維埃爲一立法機關

蘇聯最高蘇維埃基本而主要的活動形式，縱然不是唯一的，然也是法令的頒佈。頒佈法律之權，是國家政權最高的表現。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權限之內所包括的問題之中，立法權立於首要的地位。

蘇維埃法律反映着，且保護着蘇聯社會及蘇聯人民的利益，鞏固並維護蘇聯社會國家制度的原則，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獨立及其實力，蘇聯公民的權利及自由。蘇聯法律有三個基本的特性：第一，它是蘇維埃民意的最高表現；第二，法律是種法權，實施最大的司法效力；第三，法律通常包含着最普通的行爲習慣。

法律表現全體蘇聯人民的民意，它在民衆適合着歷史條件和環境的發展之下，反映着他們根本的利益。蘇聯的法律實爲蘇聯人民創造的集中的表現，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科學的綜合。

蘇聯法律最高的法權力量，不是表現在它的必須執行的最大的程度上，因爲任何一種由國家機關而來的法權，都發生同等的約束程度，而是表現在法律的不可駁斥性，就是說，除了頒佈該法的立法機關本身，誰也不能夠改變它的標準。依照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蘇聯的法律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而且也唯有蘇聯這個機關才能夠取消它或修改它。

這種法規，對聯邦及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所頒佈的一切法律亦發生效力，祇有頒佈該法的各該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自己才有廢除它的權利。但如發現聯邦共和國的法律與蘇聯的法律有什麼出入，則蘇聯的法律生效；但如自治共和國的法律與聯邦共和國的法律有什麼抵觸，則發生效力者爲聯邦共和國的法律，這個是因爲主權是來自蘇聯及聯邦共和國。

合法一詞，在蘇聯爲國家活動的原則，亦爲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蘇聯法律照例爲最普遍的準繩，因爲正是這種普遍而穩定的準繩的建立，首先表現出了人民及其至尊無上的國家意志。然而我們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最高蘇維埃不應該對個別問題，對最專門的問題，甚至對某一偶然發生而有全國意義的問題（如莫斯科全聯邦農業展覽會）頒佈法律。由蘇維埃法律的這一特性出發，便引出了它的無條件的民主性及真實性。

依法而執行法律的，又頒佈了管理的法案，如決議、命令，所有這一切均遵守着法律；但有與法律抵觸的情事發生，則立即廢除無效。

應當區別法律之中的內容——蘇聯人民的民意，這種或那種目標——與形式——準繩頒佈的程序。在蘇聯，法律的內容與形式彼此完全符合着。法律決不能規定與上述的憲法有不同的地方。蘇聯立法的程序，亦如其內容是非常民主的。

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認為蘇聯人民立法意志的表現有兩種形式：人民代表機關所頒佈的法律，即最高蘇維埃頒佈的法律與經複決程序而頒佈的法律，即是說，就法律草案的本質而言，經過居民全體的審查而頒佈的法律。複決程序的採用，實為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進而重大發展的標幟，因為這是說明了直接民權的發表，即人民直接參加立法的工作。複決或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自動提議舉行之，或由聯邦共和國中的一個共和國來要求。複決的程序，可能解決每一個國家生活的問題。蘇聯複決制度本身這種民意表現及民主主義的完全自由，不僅有蘇聯憲法保證，而且也是因為有蘇維埃國家整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環境，不論從那一方面看，由於蘇聯的沒有剝削者階級，便消滅了對民意有任何一種壓力。特別的明顯的是，最重要的若干法案，而首先是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草案，已提交全國人民討論了。複決權與全民討論的差別，是在於複決不僅先要討論，而且是直接的民意的表現，即是說，複決決定重大問題，通過或否決在複決的所決定的法律草案。

(丁)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工作程序

蘇聯最高蘇維埃，每四年改選一次。戰爭時期這個時期所以延長，是因為戰時的條件不允許蘇維埃實行改選。

就最高蘇維埃的成份、任務以及其活動的性質言之，最高蘇維埃不能夠不停息地工作。它由按期召集來解決國事問題的代表們構成。這就要定出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工作程序。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就是按期召開的全體代表大會，它有全權解決一切歸蘇聯最高當局解決的問題。例會一年召開兩次，臨時會議於必要時召集之。大會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召集，而例會則按照憲法規定的時期；臨時會議，由聯邦共和國要求或由取高蘇維埃主席團提議而召集之。

新選最高蘇維埃在第一次大會上工作的開展，採用下述程序。在兩院中的每一院，年齡最大的代表宣佈第一次大會開幕，他領導兩院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過後才決定大會程序。這種程序已成爲憲法的慣例，在聯邦共和國以及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召開第一次大會時均遵守此種慣例。

兩院會議的領導，由第一次大會上所選出的主席及兩個副主席担任。每一院的主席領導每院開會，按次序准演講人發言，指定報告人，宣讀材料，組織投票。在大會與大會之間，他保證與各代表取得接觸。

蘇聯的立法手續，經過四個步驟：（1）以立法動議的程序將法律草案提交最高蘇維埃；（2）討論法律草案；（3）通過憲法；（4）公佈法律。在資產階級國家之中，還多出一種步驟：這就是批准，由國家的元首批准。這是與「否決」權或展緩法律實行期限偶爾有關係的。統治者上層份子就是利用這種手段去限制代表機關的權力，用以防止他們的一切可能以通過他所不喜歡的決議。

立法創制在蘇聯是意味着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有權提出及通過蘇聯法律，修改法律或取消法律的權利。在實際上，這就必須將各該提案包括在兩院批准的議事日程之中。蘇聯立法創議權的主體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兩院，各代表，兩院的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政府，社會團體的總會（全聯邦的機關）以及聯邦共和國。這種權力的主體範圍的這樣擴大，充分地適應着蘇聯代議制的民主主義。

我們試舉幾個在蘇聯所實行的立法創議權的例子。

過去由代表們動議，提出並通過了全聯邦農業展覽會的法令。常務委員會提出了向獨自私營經濟徵收馬稅的法律草案，關於國際條約的批准及廢止，然第一個法律的創議人就是聯邦蘇維埃，而第二個創議人爲民族院。關於設立摩爾達維亞聯邦共和國的法律，是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提出的。每年的預算案，預算委員會須提出它關於改變收支的提案。

在資產階級國家家中，立法創議權屬於政府，國家的元首，名義上是屬於各代表。事實

上立法創議權由部長內閣所壟斷。這個也由他們的「多數黨」(即兩院中佔統治地位的政黨)所領導的政府的實力來達到目的了。至於因普通議員提到議事程序中的問題而引起之困難，那是形式上的。

盡人皆知，在一百六十年中英國下院祇通過一個法律是普通議員提出來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普通議員提出議案的困難寫道：「農業法令的歷史證明，古代羅馬的執政者，法律歪曲的發明者在訴訟程序中的詭計，第一個把欺騙程序引用到立法。英國人在兩方面都勝過他們。列入議事日程時某一提案的技術上的困難，利用各種變化莫測的形式通過議案是爲了把議案變成法律；允許敵人提議或提出提案的公式，第一是不允在議會通過，而第二是不許由議會撤出，所有這一切便造成了議會的微妙，奸計以及策略手段的無盡藏的兵庫。」(馬恩全集第十卷第四七七頁)。

立法的第二個步驟——法案的討論——在蘇聯同樣是按照真正的民主原則而組織的。報告人擁護及起草提到兩院的法律草案。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每一院對於政府法案，多半還要聽創報告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結論。

這種程序保證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對政府工作的各方面的監督，以及代表們所陳述的地方經驗的充分估計。在作完報告與副報告之後，照例要對正報告及副報告交換意見及討論。經過討論之後，才將結果做爲兩院共同的意見，其後在報告人與副報告人做了結論之後，才用

投票方式表決問題。在遇有特別情形而無人懷疑法案或需要編訂上的註解的兩院可不提付討論而直接提付表決。

討論或是在兩院分別召開的會議上同時進行，或則是舉行聯席會議。

在社會主義議會的討論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最高蘇維埃之中，不允許資產階級議會通常的那種限制討論自由的方式，如像所謂「討論的斷頭台」（英國），即是說，過了預先規定好的時間以後即停止法案的討論；或者是未經討論而已將政府的若干法律提案經過一定程序通過甚或已經把它調查之後即停止討論（如美國）。那種必須三讀的程序，即是說，通常是種空洞形式上的法案的三讀討論，這種規則也是沒有的。

蘇聯兩院中的討論，常常是回個別機關缺點的批評相輔而行的，自然，討論的自由，是誰也不能壓制的。

蘇維埃的代表具有代表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特權）。蘇維埃代表的逮捕及押送法院，祇有經過最高蘇維埃的批准，在大會休會期間，則經過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批准。

立法程序的第三個步驟，就是法律的通過。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兩院在聽了法案的討論之後，關於問題的如何處理由表決的方式決定，通常是用舉手的方法。要通過法律，就需兩院的每一院均簡單的有大多數人贊成。如法律的最後訂本是在兩院分別通過的，那就由兩院的常委會協商辦理。兩院間之任何一種意見上的爭執，任何一種解決問題時的意見紛歧，第一屆

最高蘇維埃活動的實際情形是不知道的。這可由代表們精神上的團結，政治上上的團結，代表們對提付表決之法案的最後定本所作的批評式的指示及建議的估計，以及最後，最高蘇維埃工作的一般的作風——政府態度的寬放大與其辦事實際的結合——來說明。

在決定修改蘇聯憲法的問題之際，遵守特別的一個保證——要求有條件的多數，即每院三分之二的投票。

最高蘇維埃中通過法案時的無需秘密表決，這是由於蘇維埃代表不必怕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從另一方面看，對蘇聯選民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代表在各方面的活動。秘密投票倒是使代表對自己的選民卸去責任，與蘇維埃代議制的精神及真正民主的要求相矛盾。

第四個步驟，就是法律的公佈。在蘇聯，法律的公佈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責任，由蘇聯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法律在技術的外表上，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祕書長簽字，法律頒發的日期，書明為最高蘇維埃通過之日，但是由法律公佈之日起始發生效力。法律原文須由無線電廣為廣播週知。法律及指令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報』中公佈譯為十六個聯邦共和國的語文。

蘇維埃代議程序的民主主義，與它內容中的民主主義完全相合。

(戊)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委員會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兩院，由代表中舉出若干人成立幾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及臨時委員

會。第一種委員會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整個全權期間活動着；第二種委員會，則在兩院對它們所規定的時期以內有所動作。在每一院總共設立三個常務委員會；立法設計委員會，準備對一般立法問題給一個結論；預算委員會，對於預算及財政的立法問題有同一的職能；外交事務委員會，對於國外政治意義的法案方面亦有同樣的職能。

蘇聯最高蘇維埃有權對各個法案的最後編訂設立委員會。

上述各委員會由兩院各自選舉，並對它們負責。常務委員會的人數不多，在十人至十三人之間。常務委員會之下通常又分設籌備委員會，該會為研究各項問題起見又設立幾科，邀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其他代表們以及各社會團體的主席及聞人專家們參加。常務委員會享有立法的創制權，徵集材料及召集行政機關主席出席的權利，考察國家機關任何一部門的權利。

常務委員會由兩院推選之主席為首。

預算委員會工作得特別緊張。在一九四〇年，它吸收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五十三個代表和蘇聯社會團體的主席及權威的名人計一百五十餘人去審查政府所提出的蘇聯預算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上，該委員會發現在蘇聯徵購包皮的人民委員部濫支九千五百萬盧布的補助金，於是在這方面犯法的人民委員部受到蘇聯政府嚴厲的制裁。

兩院的委員會是最高蘇維埃的職責輔助機關。其工作無論如何不會代替了最高蘇維埃的

立法工作。

在資產階級議會中所設立的許多委員會，早已成爲「幕後的議會」，幕後秘密擬定法律的中心，甚至事實上是狼狽爲奸而在部長及官僚領導之下的立法的中心。這些委員會有廣泛的可能去阻礙，甚至打消對他們不利的法案。美國法學家威爾遜於最後當了總統後，曾對送交委員會的議案寫道：「照例地，送到的議案爲否決的議案。離開祕書處而送到委員會的屋子，它便經過議會的空氣橋樑而被擱在被人遺忘的暗室中了，從那裏是永遠不復返了。」

(己)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監察工作

蘇聯最高蘇維埃對蘇聯國家的最高管理機關的工作，享有最高領導及監察主權。立法與監察，立法的職務與最高的領導實爲彼此非常密切連系着的職務。最高蘇維埃所實行的最高監察權，在立程法序上是通過委員會，是利用詢問代表的方式而實現。蘇聯憲法責成政府或人民委員部在三天之內答復某院代表的質問，這個質問的人就是該院的議員。質問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大會上由代表利用過。一羣代表向政府提出外交政策的質問。在第二天，莫洛托夫即作了關於蘇聯國際地位的報導。

實踐已規定對代表的任何問題均負有答覆之責。

不論在討論法律草案之際抑或成立政府之際，兩院委員會的工作是對人民委員會工作缺點的批評，在蘇聯已成爲最高蘇維埃方面監察的有效形式。成立調查委員會及審查委員會的

權利，同樣也充作最高政權去監察國家機關活動的工具。調查委員會及審查委員會有權收集任何一種材料並召集任何一個人去達到其完成任務的目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尚未使用這種權力者，實因迄今尚未發現必要。

因此，蘇聯最高蘇維埃享有一切權力及可能去實現它對蘇聯各機關的監察及最高的領導。對聯邦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的政府而言，類似的權力亦屬於每一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所有。

資產階級的議會被剝奪了一種可能以便對政府的活動實行有效的監察，因為在事實上，它自己也完全依賴着政府，加之，這種管制的許多槓杆已由議會手中喪失了。質問權甚至在形式上也是隨處皆有（如美國），而保留着這種權利的地方它又是竟無結果的，因為政府可不作答，而政府的答覆往往又不許議會討論。

議會調查委員會工作的經驗已證明了它的形式性，它往往祇作為輿論對政府機關太不遮眼的弊端而憤激的通氣孔。

連資產階級的法學家自己也非常懷疑地去估量議會監察的效力，而尤其是由議會去領導政府。

（庚）蘇維埃代表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作用，值得特別做一考案。

作爲人民代表者的代表，在蘇聯享受到廣泛的權力。完全而無限制的參加兩院的立法工作，參加委員會的活動，質問權，以及代表的神聖不可侵犯，所有這一切均真實地對他們着實承認而有保障。這些廣泛的權力，是與代表們的責任義務以及他們對人民的責任心適應着的。代表們對選民的職責及依存性，有這樣的保證：選民在限期以內享有召回代表的權力，代表們對選民按期報告的責任，選民有權交給代表們必須執行的命令（無上的命令）。蘇維埃代表進行着廣泛的議會以外的工作：接受選民的訴告及聲請，幫助地方的蘇維埃，組織法令的執行。至於這些活動的物質保證，就是得視其代表活動的功績而對他的費用予以補助（與選民有關的費用）。

蘇聯的代表爲人民的公僕，對人民說，是他意志的負責的反映者。斯大林曾說過：「代表必須知道他是人民的公僕，人民在最高蘇維埃的使者，他必須照人民給他的指示而行。」（在莫斯科斯大林選區大選前夕選民大會上的演說，國家政治出版局，第六頁，一九四五年）他必須是獻身於祖國及人民的利益的列寧—斯大林型的政治家，社會進步的成員。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多爲蘇聯國內的名人，優秀而有才能的工農。農工業中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傑出的政治工作人員，知識份子優秀的代表。

(三)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的集體總統

最高國家政權的某些職務，如對行政機關的經常監督，國家在對外關係上的代表，高級負責人員的任命及撤換，必須有系統而經常不斷地去實現。在上文之中已經述過，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不可能成爲一個經常實行的機關。最高國家政權的某些職務，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執行之。然而，這個機關祇對行政加以監察，自身並不是直接的國家行政機關。這一點就是它與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以及蘇聯其它國家行政機關重大的區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是一個經常動作的最高的國家政權機關，是一個集體的蘇維埃總統，而不是單個的蘇維埃的總統。

在資產階級國家當中所流行的，是國家的單元首制。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不對議會負責，他是與議會均衡的，並保證了行政權——政府——的脫離議會而獨立，總統在名譽上及事實上成爲政府的首領。國家元首的權力極大，這些權力包括着議會的解散（在英國），對國會所通過的法律的『否決權』（在美國），任命政府及更選政府的權力，不經議會而以命令形式發佈法案的權力，統率軍隊，對外代表國家。一國元首——總統或君主——的這些權力，在資產階級國家之中給予他一個可能去抵抗與他作對的議會。誠然，在事實上，比方在英國，行使這種權力的不是國王，而是行政當局——大臣內閣。

在蘇聯，蘇維埃的集體總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享有它爲行使其職權所必要的極大的權力。但作爲蘇維埃集體總統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基本的特點，是它充分的民主的機構及其對最高蘇維埃的責任。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由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兩院的聯席會議上用分別表決的方式選出。在某些資產階級國家之中所實行的人民對總統的直接選舉，並非是民主的，因爲國家的元首與同樣依靠人民作爲自己權力來源的機關（議會）是互相對立的。此外，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的一個總統的影響，比議會全體代表的影響還要大許多，因爲每個議員祇是獲得一小部分人民的委託，歷史的經驗證明，人民的直接選舉總統，可引到不滿意的後果，並對他造成事實上不負責任的條件。真正的民主主義要求經常動作的國家政權機關，由最高的代表機關選舉，而不是全民投票，是對國家最高代表機關負責的及受其監視的。

蘇維埃制度的本性及全國問題的集體解決原則，說明白這種機關的集體性，而不是個人性。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主席團，由一個主席，十六個副主席（按聯邦共和國的數目定出），一個祕書長及二十四個主席團的府委組成之。上述諸人均須爲蘇聯最高蘇維埃之代表，因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是最高蘇維埃的一個組成部分。所有聯邦共和國的表之被選爲副主席，同樣是表現了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平等，同時保證了聯邦共和國去參加蘇聯最高管理的

實現。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職權的期限，與蘇聯最高蘇維埃職權的期限一致。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府委可以在任何一個時期在最高蘇維埃大會上決議而在尚未滿期以前撤換。

(甲)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權限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權限由蘇聯憲法規定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執行着國家元首普通的職務以及對蘇聯最高蘇維埃組織性質的職務。由它的國家主權出發而作為蘇維埃國家的元首及全權的承擔者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擔負着範圍很大的責任。

在內政方面，屬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者，由於蘇聯人民委員會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負責，因之有管制蘇聯人民委員會之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開幕期間，大會即解除職務，並依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推荐，任命幾個蘇聯的人民委員，但須經最高蘇維埃對這些法案的追認，取消蘇聯人民委員會以及聯邦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及命令，如果有這些決議及命令與憲法抵觸之際。這裏還指着憲法上的監察權及其它問題，如法律解釋權，不問其內容如何的通過之權，不在行政管理機關權限以內所頒佈的不可延緩的國家的命令，赦免權，頒發蘇聯勳章及獎章權等等。

歸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對外方面的活動的，是遇有軍事進攻蘇聯或根據反侵略的互助義務而必須履行國際義務時的宣戰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休會期內），國際條約的批准及

否決權，蘇聯外交代表的任命及撤換，接受外國所委任的大使的國書及召還狀。

最後，在蘇聯國防方面歸最高蘇維埃職掌之權，是它對高級武裝統帥部的任命及撤換，總動員及部分動員的宣佈，蘇聯個別地方或全蘇聯戒嚴令的宣佈。

(乙)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是法律承認的法令。它的意義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權限及作用而定。

我們必須對法令及法律之間的相互關係特別說幾句話。法律不能夠包括了國家社會生活方面的一切多種多樣性。但法案則照例得於法律所未能直接談到的地方將法律變通採用，因為法律不可能預先就考慮到一切在變化中的地方的，部分的且有的是有時間性的問題。在這種場合，法令得將一般的準則變通適用到部分的及特殊的現象方面，但仍保存着法律的意義，使命及精神。

特別值得一述的，是在法律解釋方面所頒佈的法令，這種解釋，必須保證司法行政機關對法律的最為正確而準確的應用。

法律的解釋，是為一切人的全國的及必要的法案，其目的是闡明法律的用意而獲得正確的及準確的應用。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祇曉得這種全國法令頒發的一個程序——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法律解釋的例證，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及全年十一月一日的法案，

它將選舉法應用到立法者所未能料想到的場合。這是說的剛才由社會的及民族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而加入蘇聯的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以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在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在農村地方提出候選人的程序。一九三七年的蘇聯選舉法，給集體農場的農民大會以提出候選人的權利。然而在這些區域，尚未有而且現在還沒有發生羣衆性的集體化。所以選舉法準則的形式主義的應用，是意味着農民權利及法律精神本身的破壞。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解釋是，提出候選人的權利，在這些區域的農民是按鄉村蘇維埃辦理，而不是按集體農場；這是唯一正確的法律的解釋，完全這合着它的願望及本質。這個新的準則，是將一般的法律準則應用到個別地方的最正確表現。

對於那些在權力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應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一定批准的法令，也應當加以討論。由於不可久待的必要，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佈了關於成立新的州區，新的人民委員部以及鞏固勞動紀律等等的命令，但須於蘇聯最高蘇維埃形將來到的大會上予以追認。這些命令形式化了廣大勞動大衆的創議精神。舉例來說，這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關於鞏固勞動紀律以及改用八小時工作制所頒佈而由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七次大會所批准的法令。這個法令的頒佈，在日益迫來的戰爭威脅的集體之下，調劑勞動問題及延長工作日，是不能久待而極爲必要的。這個命令，是直接由中央職工委員會提議而頒佈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其法令具像化了人民的立法創制精神，故由蘇聯最高蘇維

埃例會一致支持。在這種場合，命令又是嚴格合於法律的準則的，立法者決定了它的命運，同時這種法案的國家的適宜性，已由報紙上，勞動人民社會組織的會議上預先廣泛的討論證明了。

X

X。

X

蘇聯最高國家政權的活動，表現了蘇維埃國家進一步的民主化，說明了法律穩定性的鞏固，以及國家政權機關對行政管理機關管制的加強。

蘇聯的最高政權，真正人民的民主的政權，是在全世界上最民主而最富於人民性的。

蘇維埃代表——自己人民的公僕

蘇聯司法顧問 A·S·斯匹克托洛夫

蘇維埃國家的國家最高政權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是每隔四年，在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權利的基礎上，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推選出來的。

所有蘇聯公民，凡是年齡滿足十八歲的，不問種族和民族的隸屬關係，宗教、教育程度、居住資格，出身，財產狀況及過去的行爲，都可以參加選舉。

第一次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舉行的。本來在一九四二年應該輪到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不過由於戰時的非常情勢，不便依期舉行選舉。所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特別命令在戰時延長代表的全權。

蘇聯人民的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新的選舉，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及一九四七年二月（各民族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分別舉行過了。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全國有六十種民族的居民。蘇聯的人民具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形式的自己民族的國家。此外還有幾十種居民住在蘇聯的民族有着自己的自治聯盟，以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區的形式，參加入加盟共和國。每一個民族共和國都由自己最高蘇維埃實行統治的，而每一個民族在加盟共和國裏的權利，是由民族院——蘇聯最高蘇維埃議院的代

表所代表的，每一個加盟的自治的共和國，每一個自治區，都派遣代表到這個議院裏去。

另一個最高蘇維埃的議院是聯邦院，這裏的代表們是代表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利益而不拘其民族關係的。

聯邦院和民族院兩院的代表，包括所有居住在蘇聯國內的民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阿塞爾拜然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土克曼人、烏茲貝克人、達吉克人、卡薩赫人、吉爾吉斯人、卡累利阿人、摩爾達維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亞勃哈斯人、猶太人、奧什丁人、鞏韜人、鞏韜人、布梁人、維庫人、楚瓦希人、烏德摩爾人、巴什基爾人等等。

聯邦院由六百八十二個代表組成：二百八十七個是工人代表，一百三十一個是農民，二百四十四個是蘇維埃人知識份子的代表。聯邦院裏有十八個代表是科學院院士——蘇聯最著名的學者，有四十八個代表是蘇聯英雄，其中有十一個是蘇聯雙重英雄，三個是蘇聯三重英雄。三十九個代表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在代表之中，有十九個曾在學術、技術、文學及藝術部門的卓越的勞作而獲得斯大林獎金的。五百三十五個代表曾受過蘇聯獎章和獎狀。在聯邦院的代表之中，有一百一十一個是婦女，五百七十六個是共產黨的黨員，一百零六個代表沒有黨派關係。

民族院有六百五十七個代表。其中有二百二十四個是人工，一百九十八個是農民，二百

二十五個是知識份子和職員，五百零九個代表是共產黨員，無黨派關係的代表有一百四十八人。民族院代表之中有一百六十一個是婦女。除了前進的工人和農民之外，在民族院的代表之中，還有許多醫師、技師、教育家，五十四個蘇聯英雄，十三個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十六個是斯大林獎金膺受者。

在地方蘇維埃裏，蘇維埃國家的工人代表約計達一百五十萬個，其中有四十三個八千個是婦女。

蘇聯的國家政權，是以人民的代表機關形式而隸屬於全體人民的。全國由城市和鄉村勞動者代表的蘇維埃所統治，每七十個蘇聯成年國民即有一個代表參加蘇維埃。此外還有好幾百萬的蘇聯公民，積極參加地方蘇維埃的羣衆輔助機關——常務委員會的工作。

在作爲農村地區和工人村落的政權機關的蘇維埃組織中，計有一百零九萬九千七百四十個代表，在城區和地域蘇維埃中有二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個代表，州和區的蘇維埃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個代表；在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裏有二千三百二十個代表；在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有四千六百五十二個代表，最後，蘇聯最高蘇維埃有一千三百三十九個代表。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有類似的人民的政權。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是蘇聯人民真正的代表，他和蘇維埃國家的工人、農人和知識份子，是血肉相連痛癢相關的；他決不像資產階級國家的國會議員那樣站在人民的頭頂，而

只是從並列中躍上前頭。民族院的代表參與解決最嚴重和重要的問題，如國際協定問題，戰爭議和，適用蘇聯憲法的管制，蘇聯國防的組織，民族經濟與國家預算案的審議和批准，全聯邦的法制的草議，全聯邦的法律和大赦案的頒布。蘇聯高等法院的選舉和檢察總長的任命，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選舉。他參與最高蘇維埃會議工作法規的制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的批准，這種命令是指最高蘇維埃會議與會議期間頒發，和其他法律條例的通過；蘇維埃的代表們參與最高蘇維埃關於外交、立法及預算等等委員會的工作。

蘇聯第一及第二屆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所通過的最重要的法律，值得引列的有：蘇聯，加盟及自治共和國審判制度法（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第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二次會議通過），蘇聯民法（同上會議中通過），普瀋兵役義務法（一九三九年），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加入蘇聯為構成員法案（一九三九年）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改造為卡累利，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法案，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改建法案，通過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聯法案，（一九四〇年），批准蘇英在對希特勒德國及其歐洲附屬作戰時期同盟及戰後時期合作互相協定（一九四一年），加盟共和國建立軍事編制法案，允許加盟共和國在對外國關係方面有全部主權法案，（一九四四年）個別年長及齡現役軍人復員法案（一九四五年），蘇聯復興及發展國民經濟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五年計劃法案，批准兩院立法委員會建議法案，以及關於記入修訂

及補充蘇聯憲法條文法案（一四七年）等等。

蘇維埃代表在審議和通過這些法案的時期，首先是取決於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他們對之負責自己的選舉者的利益。在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決定，往往是在交易所、銀行、企業主等的影響之下進行的，他們照例是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密切聯絡的。例如一九三九年在倫敦出版的西蒙·海克斯（Simon Hax）所著的「保守黨國會議員」這部書，暴露出誰在事實上統治英國，英國國會議員們用何種方式為私人利益而決定英國的外交和內政政策。西蒙·海克斯分析保守黨徒的社會構成，他們會經長期地——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選舉——英國議會裏的政府派。根據海克斯的統計資料，差不多有半數保守黨議員——約有二百人——是都處於工業，貿易和金融企業的主持人的地位。由於其中有許多人有這種「兼任」，所以這兩百個議員所佔有企業經理人的地位的總數，幾乎有七百七十五個。因此，平均起來每一個議員兼任四個經理人的職位。就在一九四五年的議會選舉之後，在新議會裏總共有三十五人，而在新議會的議員中，還有七十四個大銀行家，工業家和大公司的經理。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每一個代表，都有權向任何一個負責人及機關，向部長或部長會議提出質問，他們須在三天之內負責給與答復，如果代表的質問沒有獲得答復，代表有權要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協助，它可以運用自己的政權力量，強迫滿足代表的質問。

蘇維埃代表的人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蘇聯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蘇聯最高蘇維埃代

表，非經蘇聯最高蘇維埃之同意，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休會期間則非經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之同意，不得加以審判或逮捕」。

蘇維埃代表具有創制法律之權，即是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提出過去，補充及修改蘇聯法律建議的權利，例如蘇聯的年度預算，就是根據代表在兩院會議或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的預算委員會提出的建議而處理的。

任何一個蘇維埃代表都有權對任何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說明自己的意見的權利。蘇聯各部部长——政府人員——在最高蘇維埃的大會上，不僅要受到蘇維埃代表的批判，而且對於各部內個別惡劣的工作人員，還可以依照代表的建議而被革斥。例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中，蘇維埃代表日丹諾夫和巴奇洛夫，就曾對儲備及水運人民委員會，對技術事務及其他委員會的工作，提出嚴厲的責備。蘇聯人民委員長會議主席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上提出政府的新的人員，承認代表時許多人民委員長的批評是正確的，在大會裏提議用新的人員來撤換當時工作惡劣的人民委員長，以促進滿足最高蘇維埃的人民的意志。最高蘇維埃通過了莫洛托夫這個建議。

蘇維埃代表是自己人民適當的僕役和朋友，蘇維埃社會意志的執行人，他決不離開自己的選舉人。代表經常向選舉人報告自己的工作：在地區和企業的選舉人會議，在報紙上，在無線電廣播中，他在議院的演詞作為公報發表。他對選舉他的人民大眾負責，將自己的行動

回答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的選舉人會議席上，斯大林會在自己的演說裏提到蘇聯人民代表。他說：「代表應該知道他是人民的僕役，是人民在最高蘇維埃裏的使節，他應該依照人民所賦的使命而確定自己的行動方向」。如果代表不能獲得自己選舉者的信任，他們可以在任期滿足以前召回這個代表，而代以更相當的別的代表遞補。

如衆所週知，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往往會叛離人民，並不是人民意志和人民期望的執行者。在議員和人民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在這裏，蘇維埃代表和資產階級的議員有原則上的差別。

「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說——則在代表選舉人之間，就存在着若干特徵，我會經說過，是非常奇怪的關係。在選舉之前，代表們向選舉人花言巧語的玩手技，追從選民，表示決心效忠，不惜海誓山盟，表現出代表是完全服從選民的。可是只要選舉完成了，候選人一變而爲正式的代表，他們和人民的關係立刻澈底改變了。代替代表對選民的附屬關係，他們獲得對選民完全的獨立」。

資產階級的議員和自己選舉人的隔離和獨立，結果有如西蒙·海克斯所寫的：「選舉人幾乎不知道他們的代表如何在議會裏代表自己，他如何發言，如何演說，在議會的會場裏做些怎樣的政治行動。他們也很少知道他們的社會地位，不知道他們對於現行政策上有重要問

題的真正的觀點。大部分的選舉人的眼睛甚至並不睬自己的代表」。議員們爲「國家全體」而出現，却不是爲着選舉團照資產階級的法律所載，議員們和選舉人賦與的指示和責任毫無干涉，他們對選舉人並不負責。資產階級的議員以各種選舉機關和欺詐的手段而踏進了眾議院或貴族院，在另一天，當自己當選之後，就「忘却」了自己對選舉人所立的誓約。倘使選舉人也想要求調換代表，那是辦不到的，因爲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代議員而不選他的選舉者的利益的保障者。召回代表的權利，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並不存在的，在美國的若干州和瑞士的邦的法律上公布的召回權，第一，只適用於市政官員集體，第二，由於那樣複雜的選舉機關的混淆，結果事實上選舉人的召回權是無法實行的。這應該指出，如在加利福尼亞州（美國）實行約有一百種關於城市及鄉村自治機關人員撤換權的法律，而按照美國自己的法律學家所證明的，這種法律實際上也是混亂和複雜到無限的程度。按照召回的統計證明加利福尼亞選舉人在過去五十年內可能實行召回權的只限於一個官員。在瑞士，召回權的實施也是非常有限的。

議會對於許多資產階級的議員們，首先只是達成升官發財慾望的工具，就是那位西蒙·海克斯在他的那部著作中寫道：「壓倒多數的議員——保守黨員具有私人財產的興趣，惟使政府走上應該讓他們獲得利潤的道路」。保守黨員——議員摩里斯·漢里——哈契遜用他稀有的辯才寫道：「財政這就是我的職業。我懂得：金錢爲一切事業之母，而它的父親是利潤

的慾望。」

決定蘇維埃的代表的行動的，是另一種興趣。

一年以前，當推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候選人的時候，莫斯科最大的紡織工廠「三山製造廠」的工人和職員集團會議，推舉女總工安娜·謝蓮金娜爲候選人。「三山製造廠」的員工集團充分懂得她是值得讚揚的先進的女工。安娜·謝蓮金娜的名字不斷出現在榮譽牌上。在衛國戰爭時期，工廠接到要獲得新的紡絲品種的任務，安娜·謝蓮金娜首先獲得新的紡絲品種，她的成功，很快成爲全部聯合工廠的財產。

安娜·謝蓮金娜獲得尊敬，成爲活躍的社會事業家，非常出色的同志和可親愛的人。員工集團決定推選安娜·謝蓮金娜獲得重要的政治的職位。工人，技師和職員們知道謝蓮金娜曾經接連十三個表現其信實無欺，相信她一定是自己選舉者的忠誠可靠的僕役。

莫斯科市克拉斯諾濱列斯寧選舉區的全體選舉人都投候選人安娜，謝蓮金娜的票，一致支持「三山製造廠」工人職員集團的建設。安娜·謝蓮金娜成爲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了。

那麼，代表安娜·謝蓮金娜又怎樣爲自己的選舉人服務呢。她照舊在自己的聯合工場裏做工，而只在日常的工作時間間結之後，才處理自己的政治上的事務。她常常到建設在她的選舉區裏的「薩拉托夫—莫斯科」瓦斯配給管的建築處去。她在房間裏檢查，怎樣燃燒數數在首都的新的瓦斯。她和技師及工人們商量。代表安娜·謝蓮金娜如何和政府各部及各種官

署連絡，表現在她對於使自己選舉區內工人住宅最迅速地瓦斯化的建築方面的幫助上面。她幫助他們排除各種困難——有關於物質調度上的不適時機及勞動力不足等等。

在晚上，她在克拉斯諾達列斯賓區蘇維埃裏接見選舉人。

選舉人對自己的代表作各種各樣的聲訴。這位代表各別地研究這些聲訴，並負責的相當機關以自己的權力滿足居民的合法的要求。

有一個大學生向她提出請求，幫助他轉入另外一所學院。謝蓮金娜研究這個大學生的請求是有理由的，就向蘇聯高等教育部提出聲請，這位大學生的請求獲得了滿足。

另外一個女選舉人向安娜·謝蓮金娜請求查訊她那個沒有從戰場回來的兒子的消息。謝蓮金娜逐個地向許多的組織查訪，很快地就把有關這個兒子的必要的消息告訴她的母親。

年輕的蘇維埃代表謝蓮金娜常常和更有經驗的斐陀洛娃及列昂諾娃討教一切。地下鐵道女建築師斐陀洛娃和女教師列昂諾娃已經是第二次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了。她們的經驗對於安娜·謝蓮金娜當代表的事業上給他極大的幫助。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還有一個是伏隆涅滋醫科大學的七十二歲的老教授A.G.魯沙諾夫，他已經做過四十七年的醫生。一八九八年就是莫斯科大學附設醫院的駐院醫師，後來做過喀德鄰諾斯拉夫和平山縣的地方政府醫師，伏隆涅滋縣立醫院的老醫師，伏隆涅滋縣醫療部的主要醫師，伏隆涅滋醫科大學醫療化學的最重要的講師，教授，醫科博士，二十種科學研

究的著作者——這裏簡單的履歷已可以說明 A·魯沙諾夫偉大的有益的事業了。

這位學者在選舉之前向人民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爲着祖國、自由、工農政權，一切我們在我們伏隆涅茲州裏所有的醫院，綜合醫院，托兒所，休養室，不錯，我是高級政權機關代表的候選人，而你們是自己鄉村的政權的選舉人，所有這一切在我國都成爲可能，靠了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黨，這是列寧和斯大林所創造起來的。」

「日耳曼匪團背信侵攻我國，使我們人民不得不經歷到困苦年份。然而，現在重新回復到和平的勞動了。我們將更迅速地復興與爲德國人所破壞的，我們也將更加鞏固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濟和防衛力。我們將順利完成我們的任務——這放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因爲有偉大的斯大林領導我們。」

「你們推選我爲聯盟蘇維埃的代表。我衷誠的深表感謝，並將盡力不負你的信任。我完全信從你們的。」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全國舉行蘇聯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十六個兄弟聯盟共和國構成了多民族的蘇聯。

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不同的地方就是只有一院。在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沒有存在兩院的必要。每一個在聯邦的制度的基礎上參加加盟共和國的自治共和國，有它們直接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的特別代表。

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是共和國唯一的立法機關。他們由本共和國的人民賦與全權實施聯盟共和國領土以內的國家政權，加盟共和國賦的最高蘇維埃以權力，審議和修改加盟共和國憲法，批准參加加盟共和國的自治共和國的憲法，確定國界，批准國民經濟計劃及共和國的預算，分派加盟共和國外交上的代表，確定軍事編組的程序，實施大赦及公民的減刑——爲共和國司法機關所判定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選出主席團，組織共和國的部長會議，選舉高級法院。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和它主席團的權力的遍及共和國一切現實生活部門，略同於蘇聯最高機關之執行蘇聯憲法。

不久以前，選舉集團在蘇聯國內完成了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四千六百五十二個代表的選舉。共產黨和無黨派關係的候選人集團到處被選，差不多是百分之二百的選舉人都參加投票。

在被選舉的代表之中，有蘇聯重要的政治家，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的領袖，工人，農人，著名學者，醫生，技師，教師，共產黨和無黨派的。

每一個國民都希望在自己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裏看到自己的領袖——斯大林。斯大林被選爲全部加盟及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第一個代表。

在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七百五十二個重新被選舉的代表之中，有三百個工人，一百廿三個農民，三百二十九個職員。在全部代表中，有一百九十一個是婦女。被選舉的代表，遍

及於居住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二十五個民族和種族。

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選出了四百十五個代表，其中一百七十七個是工人，一百二十個是農民，一百十二個知識份子的代表。在被選舉代表裏面，有一百十二個是婦女。

全部加盟和自治共和國的選舉，都有類似的總結。

誰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這樣的代表呢？馬利亞·薩留巧娃，是蘇俄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她已經是第二次被選入最高蘇維埃。

她開始踏上自己勞動的道路，早在三十多年以前，符特雅縣的鄉村學校教員。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薩留巧娃基洛夫州國民教育機關裏工作，後來調到莫斯科，薩留巧娃會連續主持莫斯科國民教育局的學校教育局，後來主持莫斯科州國民教育局。經過了兩年間在這職位上有益和成功的工作之後，政府就任命薩留巧娃爲共和國國民教育副部長。

薩留巧娃在一九三八年被選爲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

一九三三年，薩留巧娃擔任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首都所有學校，劇院、俱樂部、圖書館和公園，都是在她的管理之下。

她在一九四六年因夏季選舉而主持兒童健康休養方面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夏季，就有二十八萬年輕的莫斯科人到健康營和療養所休養。在莫斯科市面，由於馬利亞·薩留巧娃的創議，建立起兒童健康場地，在這裏有數十萬兒童在醫生和藥員的撫育之下，巧妙地和大大地

利用了自己的餘暇。

她用自己的工作吸收住許多教員和成羣的兵士會員。

到孩子們休息了以後，馬利亞·薩留巧娃又集中力量不顧疲勞地巡視首都各校，指導它們準備過冬，儲備燃料和一切必需的設備。

選舉人給自己代表寫信去，說是一所座於莫斯科市郊不遠地方的學校，修理得不好，薩留巧娃馬上通知莫斯科州國民教育局，請求撥給工具和材料以便補充修繕，然後又各別地檢查其品質。在她公室裏，有許多紙挾，這裏都是選舉人寫給代表的文件。選舉人寫給他的信，沒有一封不予答復的。

這個代表像最慈愛的母親一樣關心那些孩子們是孤兒，親屬或是在戰爭中或是被法西斯佔領者的手裏死亡了的。薩留巧娃關心這些不知道喪失者的孩子們，她向國家的和社會的機關勸募得一筆特別的款子，使這些孤兒們衣履。依照薩留巧娃向莫斯科市蘇維埃的提出的建議，在首都開辦了好幾十所學校，以供戰時從學校的坐位上直接被送到工廠裏去的工人的子弟就學，現在這些青年男女，已經修畢了中等教育，繼續在企業部門裏工作了。其中每一人都有完全的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做一個技師、醫生、教育工作者、當修畢了高等教育機關的夜校功課之後。

馬利亞·薩留巧娃在衛國戰爭時期進行她有益的和多方面的事業，以有利於人民，因而

曾經膺受最高的蘇聯勳章——列寧勳章。她的作爲蘇維埃代表的工作，也獲得高度的獎譽，薩留巧娃曾經被選爲上屆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副主席。

當一九四七年一月推舉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新候選人的時候，她的名字又被一家裁縫工廠「紅色裁縫」廠的女工提了出來。蘇聯首都的庫比雪夫選舉人就一致支持這位人民忠僕——馬利亞·薩留巧娃，而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她就第二次被選爲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這只是許多事實中的一個例子，也可說是蘇聯人民代表的最具特徵的容貌和蘇維埃代表的行爲。

蘇聯的國家結構

S·柴寧

我們在地圖上看見世界中有一個最大的領土連接在一起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上標誌着四字母：CCCP。這個國家的領土共佔二千二百萬平方公里以上。這個國家從南到北有四百五十公里，從西到東幾乎有一萬一千公里。他比美國要大兩倍半，比德國要大十五倍。

在這個龐大的領土上，住着將近六十種民族。民族集團與人民。偉大的列寧會稱沙皇俄國爲「許多民族的監獄」。沙皇制度志在順利執行自己的殖民政策，會使一切邊疆民族都處於半野蠻的狀態。沙皇政府的政策是在於挑撥民族仇恨，不讓住在俄國的各民族團結起來。這種黑暗的過去時代離開我們已經有三十年了。各民族的友誼與和睦已在蘇聯增長與鞏固起來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願聯合的基礎上，組織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蘇聯。歷史上會有不少組成多民族國家的例子。他們都是由強大民族的統治階級對弱小民族採用武力，欺騙，強迫，戰爭和奴役的方法組成的。德國資產階級君主聯邦是由俾斯麥以戰爭瓦解了奧國及普魯士戰勝了法國組成的；瑞士聯邦是由十九世紀的內戰結果組成的。在一切資產階級的多民族國家中，起統治作用的都是強大民族，這種民族的剝削階級就壓迫與剝削參加國家的其他民族。

在沙皇俄國起統治作用的就是俄國資本家與地主，在奧國掌握統治權的就是德國的剝削

者上層人物，在匈牙利掌握統治權的就是瑪第雅爾統治階級。奧國——匈牙利的統治階級曾用武力鎮壓捷克人，荷蘭人，霍爾瓦特人，塞爾維亞人及其他被統治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結果這個國家目下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已經消失了。它已經表明是不堅固的，而且已經瓦解了。

但是我們在蘇聯所看見的，完全是另一種情況。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是建立在直接相反的基礎上。它保證許多民族志願聯合，並廣泛吸收一切民族都參加國家的管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民族壓迫與不平等，宣佈了並實施了住在俄國的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直到脫離與組成獨立國家為止。許多民族頭一次獲得了可能，建立了自己民族國家。蘇維埃政權的民族政策在人民中是以其鼓吹者列寧斯大林的名字來稱呼的——就是稱爲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在社會主義改造年代，這種政策根本改變了各民族的生活制度，永遠消失了各民族彼此間的不信任。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平等的構成份子，並沒有剝削與壓迫。蘇聯各民族是由共同的經濟利益團結起來，他們之間是由兄弟友愛與合作的感情聯繫着的。

蘇維埃多民族國家來堅固性與生命力，已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三十年中經過許多次考驗了。蘇維埃國家忠貞支持了一切考驗。

斯大林說過：偉大的愛國主義戰爭已經證明了「蘇維埃國家制度是多民族國家的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代表這一種國家制度，在這種民族問題與民族合作的問題是解決得比任何其他多民族國家所解決的要好些」。

但是蘇聯國家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

蘇聯憲法寫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平等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願聯合的基礎上組成的聯盟國家。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各蘇維埃共和國結成的聯盟，以便動員一切力量與資材，建設社會主義，幫助落後民族在經濟和文化方面趕上俄羅斯的中央區，並把參加聯盟的所有共和國的國民經濟與文化都推向前進，團結所有的軍事資材與力量。

根據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曾經通過關於四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願聯合的宣言與條約：這就是俄羅斯聯邦，高加索聯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蘇聯從此成爲吸引各民族的中心，他們明顯的在蘇聯看到一種聯邦的形式，在歷史上頭一次是完全根據平等，自願與兄弟的合作原則建立起來的。在一九三六年，即在通過斯大林憲法的時候，參加聯盟的共有十一個共和國。現在蘇聯共計聯合了十六個加盟共和國，這就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貝克，卡薩赫，喬治亞，阿塞爾拜然，立陶宛，摩爾達維亞，拉脫維亞，吉爾吉斯，達吉克，亞美尼亞，土克曼，愛沙尼亞及卡累利阿—芬蘭。

所有加盟共和國都是平等的。其中沒有一個握有特權或優先權。俄羅斯聯邦雖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計有一萬萬以上人口，但選派到民族院——蘇聯最高蘇維埃之一院——的代表也是與其他任何加盟共和國一樣多。因此他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影響蘇聯的立法。自願聯合成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的各蘇維埃共和國，都根據嚴格平等原則，自動限制自己的主權，並

把這些權利轉給蘇聯。蘇聯憲法第十四條會列舉許多問題都歸蘇聯負責。這些由各共和國轉給蘇聯的權柄就可以保證蘇維埃國家的統一，與各加盟共和國的成長與發展。例如屬於蘇聯的權柄有：蘇聯爲國防交涉中的代表與其他國家締結，批准及廢除條約，戰爭與和平問題，接受新共和國加入蘇聯，組織國防與領導蘇聯一切武裝力量，根據國家獨佔原則，進行對外貿易，保衛國家安全，製訂國民經濟計劃，批准蘇聯統一的國家預算等等。

憲法寫道：「各加盟共和國之主權，保在蘇聯憲法第十四條所指之範圍內受有限制。在這些範圍以外，每一個加盟共和國均獨立執掌國家政權，蘇聯保衛各加盟共和國之國家權利。」

但在資產階級聯邦的實踐中，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種情況。著名的國家學者克林威克可以代表資本主義營壘的「理論家」的觀點，他認爲在聯盟國家內主權應屬於中央。但就是在那些形式上承認參加聯邦各部分俱屬平等爲原則的資產階級國家內，實際上強大民族的統治階級也把他們的意志強迫加之於弱小民族。現在資產階級法學家因爲要仰承反動集團的意志都來努力證明弱小民族的主權觀念已屬陳腐的觀念。

參加蘇聯的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憲法，一面估計到本共和國的特點，一面又與蘇聯憲法完全適應。每一共和國有其自己的國家政權最高機關——最高蘇維埃，及自己的政府——部長會議。加盟共和國的自動性與主權之最高表現就在他有自由的片面的退出蘇聯之

聯。這種權利已經規定在斯大林憲法中。

在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中，自由退出聯盟之權是不可想像的。美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當南方各州決定退出聯邦政府的時候，問題是由武器來決定的，即是由南方戰爭來決定的。同樣的，關於瑞士七區脫離其餘區域的同盟，也是由戰爭來決定的。

加盟蘇維埃共和國都有自己的領土，不得本共和國的同意是不能改變的；他們並有自己的公民。加盟共和國的每一公民同時又是蘇聯的公民。在戰爭年代，蘇聯憲法會有以下的修改：即給予各加盟共和國以直接與外國發生關係，並與之締結協定，交換外交領事代表之權。各共和國且獲得可能組織自己的軍隊。

這些修改所以可能，是由於各加盟共和國的鞏固與成長，已變為強大的國家，並且有高度發展的經濟與民族文化。

在若干加盟蘇維埃國家中，還包括有自治共和國與自治州，而在俄羅斯聯邦內還有民族區。例如在俄羅斯聯邦內就有十二個自治共和國，六個自治州，與十個民族區。在阿塞爾拜然共和國內就有一個自治共和國與一個自治州；在喬治亞就有兩個自治共和國一個自治州；在烏茲貝克就有一個自治共和國，在塔什克就有一個自治州。這種民族國家組織在加盟共和國內只佔人民的少數，但是聚居一地，且有與其他人民不同的民族特徵。每一個這種國家組織，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內部有其特別代表直接參加。

每一種人民，在蘇聯根據最完備的民主原則，都有可能日常參加本國的與全蘇聯的生活。在斯大林憲法中，反映着並且確定了社會主義原則及其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構成了蘇聯經濟基礎。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永遠消滅。蘇聯公民不分民族與種族都一律平等，在一切生活方面，這乃是不可動搖的法律。每一個公民不論他屬於何種民族，皮膚是什麼顏色，與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蘇聯所有人都是經過城市與鄉村的勞動者蘇維埃——蘇聯的政治基礎——積極而日常參加國家的管理。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卡薩赫人與喬治亞人，韃靼人與烏茲貝克人，奧伊洛特人與涅涅茨人，立陶宛人與摩爾達維亞人——所有人民都在蘇聯構成統一的，因共同利益與兄弟友誼而堅固團結的勞動者集體——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並且深信不疑的在布爾什維克黨與人民領袖斯大林領導之下前進，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個性與社會主義社會

烏曼斯基

社會主義的敵人很久以來就散布着各種各類的杜撰，說隨着生產手段與生產工具私有性在社會中的消滅，個性的創造活動就停止了。在資本主義的各國家中，資產階級的學者企圖證明，如果工廠，土地，各種企業，建設等的公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是社會每個成員個人福利的基礎，那麼這些人們個人的利益便溶解在社會利益之中，好像蘇聯所有的人們便會弄成一樣的高矮，有同一的願望，口味和要求。愛倫堡講過一個故事，當他和他們的同事亞蒙諾夫與加爾克吉歐諾夫曾在美國以客人資格訪問美國記者，這些美國的記者們驚異地說道：「天呀，他們彼此這樣地不相像。」實際上，「愛倫堡寫道，『我不知有什麼國家像美國這樣，達到了這種標準化的完成』。

正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秩序，把人們變成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的社會貶低了人的個性的價值，註定了人的天才與創造為資本去服務。在資產階級的世界中，一切都是買賣的對象。私有財產所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奴役着人們，分裂他們，在人們的身上養成出賣，自私自利，貪婪，追逐利潤，教育出以「人於人皆豺狼」的獸性原則為基本的精神。

然而，蘇聯的現實距離這一切多麼遠。許多世紀的過程中，進步人類的代表們夢想着一

個這樣的社會，裏面將消滅人們之間的不平等；不再有人壓迫人，不再有貧乏，窮苦，邪惡，而且個性在那裏將真正是自由的。

生產手段的私有是資產階級社會一切矛盾的原因，在這一社會中，資本主義極少數的人壓迫與剝削着大多數的人民。不消滅這種私有性，不建立生產手段的公有，人民的解放真正是不可想像的，當然，個性的解放也是不可想像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全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轉換界限。千萬的人民大眾由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着踏上了歷史的舞台，他們在全部社會關係上，在經濟，政治，及生活狀態中完成了史無前例的轉變。

在蘇聯，勞動的人們第一次佔有了他們創造出來的那些財富。隨着剝削階級的消滅和生產手段公有的確立，人對人剝削的可能性本身在蘇聯完全被剷除了，也不可能再有一羣人靠了另一羣人的貧窮化而空前暴富。同時，個性的創造力和幸福繁榮的一切條件，已經被建立起來了。

在蘇維埃的國家中個別個體的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對立是不存在的，——個體利益和社會主義社會利益是不可分的。蘇維埃社會的財富與發展水準愈高，對於每個公民的力量與才能有利於社會的應用的天地便開展的愈廣。而人之個人創造力與天才表現得愈積極鮮明，整個蘇維埃社會在它的發展中便達到更高的經濟與文化的水準。

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私有財產和階級壓迫所產生的環境，這一環境刺激着爲了自己命運和明日的恐怖中去卑屈，詭媚，撒謊爲生，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上。

社會主義社會代表着保護個體利益的唯一堅實的保證。

蘇聯的個性自由——這首先是行動的自由，基於蘇聯人沒有經常的爲明日不安，沒有失業的恐懼，在蘇維埃國家中，經濟生活由國民經濟計劃決定方向，以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勞動者物質與文化水準不斷的提高。在蘇維埃的國家中，國民經濟各部不停地發展着，進行着最偉大的文化建設。國家需要各種各樣專門技能的人們，而他們也全都有事情可做。在蘇維埃的國家中，每一個公民面前都展開着按照才能與興趣應用自己力量的一切道路。在社會主義之下，沒有也不會有失業者，沒有也不會有『多餘人的』——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旅伴。

資產階級社會中，利潤，進益是推動的刺激，整個生活是依據『金錢造人』的原則安排的，正和這個社會相反，在蘇維埃國家中，個性真正是自由的，因爲全體公民同樣都可以達到任何的專長，因爲在蘇聯不是財產地位，民族出身，性別，職務地位，而是每個公民的個人才能和個人勞動決定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這證明着對於個性表現他所包含的個人才能與天賦的自由在蘇維埃的國家中是多麼無限。蘇聯的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在社會中有崇高的地位，都可以成爲名人與英雄，都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與光榮。達到這一點的道路——便是正直而

誠實的勞動。

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艱難而恥辱的重負，它在蘇聯有史以來第一次從這種重負變成了蘇聯人民崇高而光榮的責任，公民首要的義務，因為這是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祖國幸福的勞動。

每一個認識自由勞動的快樂的蘇聯人心中，滋生着盡可能給自己國家多帶來利益的意向。因此而發生了蘇維埃制度所產生的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最高的形式——斯達汗諾夫運動，參加它的有數百萬的勞動者，它成了蘇聯人勞動生產性提高，發明才能與創造主導發展的強大積杆。在斯大林獎金的得獎人中間，除了優秀的學者，科學院院士，工程師以外，我們還看見平常的人們——男女工人們，奠定提高勞動生產性新道路的生產的革新者。不久以前得到斯大林獎金的製鞋工人華西里·馬特洛索夫，紡織女工瑪利亞·伏爾科娃，礦工格拉西莫·查波洛舍茨以及其它許多人——這都是普遍的蘇聯人，他們用自己的革新方法帶來生產方法與生產組織根本的改良，同時把科學的思想向前推進。

隨着蘇維埃國家的變化和它的力量的增長，蘇聯的人們也改變了。

社會主義制度在人民的內部，是各種各樣天才的無窮無盡泉源，這些天才們，過去與現在，在資本主義之下受窮苦與貧困的壓迫而滅亡。蘇維埃政權的年代中，從人民中出來了許許多多天才的組織家，國家工作者，經濟事業家，學者，指揮官，藝術家，工程師。

這兒有幾個例子。許多人知道在蘇聯有一個世製的老鼓風爐工人科洛鮑夫的家庭。馬蓋那甫（在烏克蘭）基洛夫工廠的技工科洛鮑夫——是烏克蘭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而從一九四六年起，他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他的兒子之——巴維爾，現在是黑色冶金部的副部長。另外一個兒子——尼古拉，是東烏拉爾冶金管理局的總工程師。第三個兒子——伊利雅，是烏克蘭的彼得洛夫斯基大冶金工廠的廠長。

另外有一個例子。卡里金娜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家姑娘，十月革命後她進城做事。進了工廠食堂學習燒飯，同時她開始在普通教育學校讀書。不久任命她做廚師，後來又任命她為工人飲食部的主任。在一九三八年，人們選她做奇鮑克洛爾城的城市蘇維埃主席，以後又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不久以前卡里金娜在食品學院畢業，如今她是丘瓦什自治共和國食品工業部部长。

泰蒂雅娜·費道洛娃的生活道路也頗可做證明。當她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時候，她去參加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建設，做過裝運工人，三合土工人，大理石砌匠，後來她進了交通學院，畢業後以工程師的資格回到地下鐵道。為了英勇的勞動，政府會頒費道洛娃數個勳章及獎牌。現在費道洛娃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科學院最著名的學者特洛菲姆·萊辛科——是一個平常的農民的兒子。三次獲蘇聯英雄名稱的亞歷山大·鮑克雷什金，在同希特勒德國作戰以前，是工廠中的鐵匠。

這一切人以及許許多多和他們類似的人們，用他們在國民經濟，科學，藝術的各種部門中的成功讚美着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人民教育出了他們。引導他們走向全民榮耀的道路，像在一面鏡子中似的，反映出蘇維埃國家歷史的勝利。

蘇維埃制度首先對人民達到教育與科學的廣大而自由的可能，這是他們在沙皇制度與資本主義之下的全部過去的歷史中被剝奪了的。

數百萬的勞動者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中受了高等和中等的教育，成了各種各樣知識部門中的專家，精神勞動的工作者。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中，國內出版了難以數計的報紙，雜誌，書籍。演劇的藝術得到巨大的發展，開辦了數千的俱樂部，電影院等等。

偉大的反法西斯蠻兇的愛國戰爭，不僅只是整個蘇維埃制度偉大的考驗，而且對於每個蘇聯人，對於他的體力與精神力也是一個考驗。

在歷史上曠古未有的這場戰爭的嚴格的試驗上，對全世界證明了蘇聯人的卓越拔羣。他被列寧與斯大林的崇高的思想鼓舞着，被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教育着。

戰爭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出的，不僅有空前未有的蘇聯人的羣衆英雄主義，而且還有蘇聯人的高度的道德水準，他的精神財富，剛毅的求勝的意志，性格的堅忍，火熱的愛國心。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像雪崩似的越過蘇聯的邊界，他們馬上遇見了自己在歐洲的勝利進軍中從所未見的人民。蘇聯的人民懷着自我犧牲的英勇，在艱巨的戰鬥中保衛祖國，守護進步與民主。

。他們消滅了世界反動勢力最大的重心，粉碎了法西斯德國。戰後蘇聯人民又獻身於和平的創造工作。他們繼續着自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勝利。這條道路上的每一個新的脚步，都給蘇維埃國家的勞動者們帶來新的物質與文化的福利。

蘇聯的人民勝利地結束了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戰後工業生產的重建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灰燼與廢墟之中，昇起了蘇聯人民重建的數百被德國蠻夷破壞的城市與鄉村，工廠與工場，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學校，醫院，毫無疑問，蘇聯人正在完全完成與超越完成新的五年計劃。每個蘇聯人帶着巨大的靈感把自己的勞動加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建造，在這個新社會中，全體人民的物質福利的豐富與文化的高度發展，使每個人的個人創造與個人幸福達到空前未有的繁榮。

4212 → 7

44219

